

领导参考

Ling dao can kao

二〇一九年第2期 总第24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重点推介

01 中国包容性崛起给世界带来机遇

02 一带一路开启 2.0 时代

聚焦中三角

05 湖北推进“放管服”改革

07 湘江潮起 长沙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纪之约

探索改革

13 从“价格改革双轨制”看国企混改理念与逻辑

17 粤力推科创补湾区短板

经济广角

18 “数字经济”发展隐忧浮现 数据安全亟待“上锁”

20 制造业 PMI 新低经济下行压力未减

科教文卫

21 “互联网+”医联体 让医疗资源从“云端”落地

22 文旅融合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24 海口旅游拓国际朋友圈

三农问题

26 干农活正在变得更“聪明”

28 中国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已成常态化趋势

30 “互联网+农业”让机收更高效

社会观察

31 中国品牌如何面对“华为效应”？

34 从出生率看中国经济

综合治理

35 从大数据看中国都市圈人口迁移

38 中国构建海洋牧场修复渤海生态环境

环球视野

40 中美贸易战的输家还有谁？

41 对华贸易战能使美国经济真正繁荣吗？

学术前沿

43 专家谈中部崛起 指日可待

讯息快递

中国包容性崛起给世界带来机遇

香港 中评网 2019年5月31日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巨轮破浪前行，一边是“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一边是“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美国一些政客口中，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西方对中国角色发生了三个认知改变。中国经济不再只是“流汗”工厂而是充满了创造力，中国政治体制不是迟早要崩溃而是充满了活力，中国不是全球秩序的被动接纳者而是积极建构者。这导致一些西方精英在面对中国崛起时不淡定，认为中国崛起会带来西方的衰弱，削弱西方技术与产业优势产业，同时也会影响西方制度模式、生活方式的基础，撼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改变了对中国以接触战略为主、以压促变的战略定位，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

新的“中国威胁论”源于对中国崛起的过度焦虑与不必要的误读。事实上，中国崛起不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中国不但是和平崛起而且是包容性崛起。

中国不会重蹈其他国家从事领土扩张的覆辙，这是由中国文明特性、历史记忆、制度性质与国家战略所决定，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中国崛起是共赢的，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而是为世界提供“一带一路”这样的平等互利合作的大平台。中国不是国强必霸，而是国强好仁，不是要控制世界关键资源，而是要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不是要争抢蛋糕，而是与世界各国共同做大蛋糕。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包容性崛起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带来投资、技术、产业和理念，使得这些国家能够提高内生发展能力，能够更好地参与全球化。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包容性崛起会带来良性竞争与发展机遇，中国的产业与科技的发展，共同拓展了人类的产业发展前沿，为西方国家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模式、文明，完全可以和西方和谐共存、美美与共、交流互鉴。

中国崛起不会颠覆现有全球秩序，而是会推动全球秩序的完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是全球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而不是颠覆者，是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

中国通过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遏制逆全球化潮流，推进新的全球化，将推动全球秩序向更公正、更均衡、更包容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包容性崛起过程将会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巨大的中国机遇。一个新型的全球性大国的崛起，将为21世纪的人类带来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上百年来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是21世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既不靠谁的恩赐，也不是谁能够遏制得了的。

美国不应把良性竞争看做是威胁，而是应该看到它将带来的巨大的历史机遇。

一带一路开启2.0时代

子瞻 香港《镜报月刊》2019年6月

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后，将高品质作为下一阶段的核心主线，既是准确对接国际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也将呼应国内深化改革目标。

高品质成为新核心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在第一阶段主要聚焦于顶层设计和政策机制的构建。随着相关工作的基本完成，第二阶段则是以项目建设为重点，围绕项目抓落实。随着一带一路2.0时代开启，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原则基础得以继续保留。与此同时，高品质发展作为新的核心要义被列入其中，为一带一路今后发展方向定下新的主基调。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要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彼时外界对于所谓工笔画的普遍解读即为以商标准和高品质紧抓具体项目落实情况。习近平在此次北京峰会开幕式演讲中再提工笔画，并明确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沿着高品质发展方向，再次为一带一路未来发展路径定调。第二届一带一高峰论坛筹委会秘书长、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也多次表示，本届论坛要在三共即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三高理念，即高品质、高标准和高水平。

在分析人士看来，一带一路转向以高品质为核心，是当前国内外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后双重影响叠加的结果。在国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高品质共建一带一路就是以高标准的基础设施为重点，打造互联互通新格局。在国内面临改革进入深水区挑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必然趋势，也必将经历从高速发展迈进高品质发展阶段。

新举措回应质疑与关切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即面临外界尤其是西方大国的不断质疑，从债务陷阱到地缘政治利益，从掠夺式贸易到转移落后产能，各种似是而非的标签不断被贴在其中。当共建一带一路进入2.0时期，中国以及丝路沿线国家开始在高品质发展的基础上，不断用新举措新理念直面种种质疑与关切。

一是以可持续回应债务陷阱。长期以来，债务陷阱是外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最大质疑，认为一带一路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手段，通过高额贷款控制沿线国家进而谋求政治利益。2017年斯里兰卡政府因无力向中国偿还贷款，将南部汉班托托港口控制权交给中国公司，此举让债务陷阱论调在国际社会更是一时甚嚣尘上。

针对这一质疑，习近平主席在本次高峰论坛上明确指出新阶段的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可持续的目标，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同时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随着一带一路朋友圈的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逐渐发现所谓债务陷阱根本是缺乏根据的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截止2017年底，约17个非洲低收入国家已陷入或面临债务危机的风险，但其中多数债务的持有人是非中国借贷方。在《2019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研究》报告中，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总结称，来自中国的资助对借款人的驱动作用似乎并未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可持续性门坎。

具体到斯里兰卡汉班托塔的贷款问题上，《纽约时报》曾报道此贷款仅占斯里兰卡债务总额很小部分，2016年谈判出售该港口时，斯里兰卡的外债为465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欠中国的部份只占10%。多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也在西方媒体上指出，斯里兰卡的债务问题并不是由中国制造。

另外，针对外界对一带一路建设或将加重沿线国家债务负担的担忧，中国财政部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鼓励中方金融机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国际机构自愿使用这一工具，提高投融资决策科学性和债务管理水平。该框架通过明确债务范围、预测宏观经济走势、开展压力测试等评估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评估结果将作为贷款决策的重要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这一分析框架有助于构建高品质、可持续的一带一路融资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国家长期发展和繁荣。

二是以高标准回应过剩产能转移。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后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东非地区首条现代化电气铁路正式商业运营，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阿贝巴至吉布提两地之间的陆路交通时间从原来的一周缩短至一天以内；蒙内铁路已经通车一年多；中老铁路、匈塞铁路正在扎实推进；吉布提新港已成为东非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港口之一；乌兹别克斯坦一条19公里长的隧道中，火车穿越隧道仅需900秒。然而，在基础设施领域取得互联互通成就的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却遭到转移过剩产能的指责。由于存在自然资源、发展程度、相对优势等诸多因素差异，产能转移与合作本是国际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转移过剩产能实则是批评在产能合作中导致对接方利益受损，究其原因在于中方与丝路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对于高标准并未严格执行，在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对接时，也未能及时解决绿色环保问题。

在一带一路2.0阶段，绿色将作为三大新理念之一，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中方在进行一带一路建设中除了自身更加注重节能环保之外，还通过投资新能源等环保产业带动沿线生态修复，对外输出先进生态治理技术。同时，中方也作出明确承诺，将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以中日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为例，在东南亚市场合作上，此前由于中日双方标准不同，迟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甚至给外界造成所谓多带多路的担心。在新阶段中，中日双方均采取由东盟统一制定的东盟标准，既避免因发展程度不同盲目追求高标准导致空中楼阁，又杜绝由于低标准造成共建国家利益受损进而影响长期合作。

三是以透明度回应小圈子。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提出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坚持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下运作，共同以零容忍态度打击腐败。在一带一路2.0时代开启之际提出增强透明度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切实响应外界长期以来对于一带一路可能造成封闭和腐败问题的担忧。目前，已有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而在两年前和中国签署协议的国际组织之和只有39个。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伙伴飞速增长，如何保持质与量并行发展，在合作中坚持公开透明成为关键一环。

中国发起《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倡议国际反腐合作打造全覆盖、零漏洞司法执法合作网，旨在进一步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开放透明。由于共建一带一路中涉及众多资金量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此举有望与上述所倡导的公开招投标理念有机结合，坚决制止在互联互通建设中形成小圈子和灰色地带。对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表示，一带一路是廉洁之路，也是法治之路。联合国副秘书长苏亚雷斯也指出，《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彰显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的关于加强追赃和被盗资产返还力度，大幅减少一切形式的腐败和贿赂行为，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透明的机构等目标，联合国对此表示支持。当一带一路步入新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也将不断出现，无论是中国还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有关各方均需要在新的维度思考解决方式。

如何激发民营企业参与活力

一带一路在新一阶段将继续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其中基建项目具有投资回报周期长、成本高的特点，因此参与其中的企业往往以实力雄厚的国企和央企为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数据表明，截至2018年底，在已开工和计划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央企承担的项目数占此达50%左右，承担了一带一路共建3,116个项目，合同额占比超过70%。

然而，一带一路作为经济牵头的重大互联互通项目，如果市场重要主体民营企业和资本缺位，无疑将对项目长期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院、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周晓晶曾撰文称，民间资本能否广泛参与一带一路关乎到一带一路的成败。除了基建项目的特殊性影响民营经济参与外，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复杂，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也在影响投资者的参与。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负责人洪灏指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低风险国家仅4个，占6.4%；中等风险国家有43个，占68.2%；高风险国家有16个，占25.4%。

面对基建项目必然存在的长周期特性和共建国家内部复杂投资环境，如何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参与将成为一带一路2.0时期所需解决的新挑战之一。目前，较为成功的解决方式是建设境外合作产业园区，构建促进中国与共建国家经济深度融合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以筑巢引凤的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同时形成规模效应后可以相对有效避免单打独斗、分散投资所面临的风险。截至2019年4月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在24

个共建国家建设了82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上缴东道国税收超过2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近30万个就业岗位。目前，通过商务部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有20家，其中4家是中央企业和国企，其余16家均为民营企业。

另外，中国政府部门还需进一步为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保驾护航，定期发布具有参考价值的风险识别产品，例如商务部每年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每年发布《国家风险分析报告》等，帮助民营经济在投身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前准确识别所面临的风险，作出合理资源分配决策。

融资模式如何多元化

多名专家指出，当前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还存在着潜力巨大的市场需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估算，2016年至2030年期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交通基建融资需求将达到2.9万亿美元。另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估算，到2030年亚洲地区每年大概需要基础设施投资1.7万亿美元。但如今亟需解决的问题在于，一带一路建设融资过程中模式和管道的单一将成为影响其高品质发展的桎梏。目前，一带一路建设融资仍以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为主，多为贷款方式进行间接融资，债券和股权等直接融资手段缺乏。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有鑫表示，基础设施建设由于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很少有金融机构能独立承担，因此私人资金参与度不高。亚洲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公共部门提供了超过90%的资金。在许多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开行或进出口银行在单个项目的支持力度往往超过80%。

融资管道和手段的单一也进一步导致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承担着主要风险，在面对投资环境不稳定的局面时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并直接影响长期发展的效率。一带一路作为开放型框架提议，成果并非由某一个国家独自享有，也不应该由某一个国家独自承担风险，因此合理引入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参与其中将成为今后一带一路发展的必经之路。

聚集中三角

湖北推进“放管服”改革

魏玉坤 香港商报网 2019年5月22日

如何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改革政策落地？记者日前随民进中央调研组赴湖北进行调研。近年来，湖北省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致力于用硬措施打造发展软环境，催生改革红利尽早释放。

放出活力 让企业“最多跑一次”

“注册新公司时申请出版经营许可证只花了半个月，而且全程网上操作，简单高效，以前至少需要一个半月。”襄阳市鸿鹄志公司负责人段永军说，办理出版经营许

可证程序繁琐，他早有耳闻，并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但没想到这次很顺利，“要不是材料没准备好，不到一周就能办完”。

这是湖北省着眼“放水养鱼”，让放权释放出市场主体活力的鲜明例证。据湖北省有关负责人介绍，湖北省先后分7批取消、下放、调整省级行政审批事项757项，执行涉企收费清单制度，做到清单之外再无收费。全面推进“多证合一”，企业开办时间从22.5天压缩到5天。

有不少企业反映，拿到营业执照后还需要很多证。对此，湖北省以深化“证照分离”改革为抓手，对第一批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分别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准入服务等四种方式进行改革，从根本上破解“准入不准营”。

从原来的企业审批“跑断腿”到现在的“最多跑一次”，放权让更多企业轻装上阵。

管出公平 助企业安心谋发展

宽进就要严管，公平的准入，公正的监管，如鸟之两翼，不可偏废。管什么？管原则和底线，还要让规则公开透明，不能搞选择性监管、任性监管。

“省、市、县三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推进跨部门、跨地域、跨层级联合检查，加强信用监管，探索综合监管，统筹配置行政处罚职能和执法资源，建立健全执法协作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这位负责人说。

武汉光谷是国内最早发起“政策众筹”的行政区域之一。

光谷创意产业基地总经理董思艺说，“政策众筹”主要是在新媒体平台开展问卷调查，向企业、产业园区等征集产业政策意见。“企业参与政策制定，发展的积极性更高了”。

“能否管得住，管得好，说到底取决于企业的体验。管不是目的，而是要做好服务，让企业安心谋发展。”这位负责人介绍。政府在抓管理的同时，努力提升服务能力，打造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梳理并及时公布政府服务事项目录，推行“一站式”审批服务，形成“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的工作模式。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还要格外注重平等对待不同市场主体。以民办教育行业为例，湖北省多次印发文件，强调充分落实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落实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同等待遇。为鼓励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还设立了专项资金，给予支持。

“政府部门定期不定期上门了解企业发展情况，询问‘放管服’政策落实情况，同时，积极为行业交流搭建平台，帮着我们解决难题。”武汉市学而思教育培训机构负责人朱书将说，“政策真金白银，期待好政策出台后尽快落到实处。”

下硬功夫 政府要当好“店小二”

打造发展软环境，提升企业获得感，要下硬功夫。硬功夫下在哪？调研组认为，关键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扑下身子走进市场，解企业燃眉之急，补制度之缺，当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店小二，让企业能多有时间跑市场、少花功夫找市长。

“教育、文化服务业较为特殊，兼具商业性和社会性，对这类企业要加强事前监管，把好红线，筑牢底线，但要格外注意监管方法，分清政府包办与引导之间的界限，强化信用监管，与企业积极互动，增强市场主体信心。”调研组有关专家说。

据悉，此次调研是民进中央开展的年度重点考察调研。教育、文化服务业“放管服”改革是民进中央此次调研的重点。在湖北调研之前，民进中央还就同一主题赴陕西等地进行了调研。

湘江潮起 长沙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纪之约

肖建花 香港《经济导报》2019年11期

长沙，又名星城、星沙，因星宿而得名，因敢为天下先而闻名。粤港澳大湾区，则是中国当下最具活力的湾区经济圈。一个是历史可溯至殷商之世的千年古城长沙，一个是新近跻身全球四大湾区的粤港澳大湾区，在今年初以两百亿规模的合作项目开局，双方开启了一场令世人瞩目的世纪之约。

对于长沙来说，千年古郡积淀的不仅只是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更多的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催生的智慧与胸怀。

“对比内陆其他省会城市，长沙作为中国丝绸文化发源地及湘楚文化中心，具有优厚的文化底蕴外，最主要的还是，长沙不是一个依靠房地产炒作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智慧城市’。”九龙仓集团副主席李玉芳对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胡衡华这样评价长沙。

2017年11月1日，长沙从全球多个城市中脱颖而出，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成为亚洲首个、中国首座获评世界“媒体艺术之都”称号的城市。

然而，这仅仅是长沙智慧城市的一个缩影，千古风流的长沙同时还拥有“智造之城”、“工程机械之都”、“国际美食之都”的美誉，成为不折不扣的“四都之城”。

2019年4月3日，湖南携数百个项目赴粤港澳大湾区“招亲”，现场签约311个项目，投资总额超过1.37万亿元，涵盖重大片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农业、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产业和领域。这次湖南队粤港澳大湾区的“招亲”活动也同时开启了长沙与粤港澳大湾区世纪之约。首次交集，长沙就与粤港澳大湾区拟签约项目38个，投资总额273.56亿元。此外，在招才引智方面，长沙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在智能制造及应用等领域深化合作。

“招亲”过程中，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胡衡华陪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在香港走访了香港九龙仓集团、招商局集团、华润集团等多家本港知名企业。其中九龙仓集团是本港十大地产商之一，其投资200亿元兴建的长沙国金中心是长沙迄今合同利用外资最大的项目，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2019最佳国际购物中心”。

长沙之锐，敢为天下先

深水良港，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达地区的标配，湾区经济也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版图中最醒目的亮点。湾区经济以开放性、创新性、宜居性和国际化为其最重要特征，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分配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球四大湾区的新贵，其经济影响力后来居上，超过了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三个老牌湾区，位居全球第一。《四大湾区影响力报告（2018）：纽约·旧金山·东京·粤港澳》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影响力指数排名第三，经济影响力位列四大湾区之首，体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基础和建设方面的潜在活力。

2018年10月，香港总商会及汇丰推出联合调查，大部分受访企业高管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未来三年的经济增速将高于中国其他地区。调查指出，大湾区预计可以为所有行业创造商机，三大最能够受惠的行业分别为：技术与创新（53%）、贸易与物流（45%）及金融服务（44%）。

观察人士认为，这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旺盛的增长力和创新力，以及作为国家战略甫一推出就引发的“聚光灯效应”。5.6万平方公里、7,000万人、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元，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对湖南的发展有着挡不住的诱惑。

“多年来，湖南的改革开放与粤港澳地区的发展紧密相连，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是湖南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要机遇，也是广大企业的重大商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说。

而长沙作为湖南对接大湾区的排头兵，正在有效进行排兵布阵。为把握好这一机遇，长沙适时提出“主动融入，拥抱‘溢出效应’。”在这一背景下，长沙从整个大湾区层面来谋划和推动自身发展，依托国家级湖南湘江新区、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等平台，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明确要借力大湾区打造长沙先进制造业、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高质量低成本现代生态大都市，其目的是要承担起“内陆发展第一腹地”的关键角色，赢得开放发展的主动权。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提出之后不久，第十三届泛珠区域省会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在长沙举办，敏锐的长沙捕捉到了大湾区带来的无限商机，提出了“开放互动、合作共赢”的战略构想。“办好长沙的事，脚踏实地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构建好长沙的局，扎扎实实地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崛起发挥长沙智慧，让长沙真正搭乘大湾区这艘经济航母。”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胡衡华在峰会上一再要求长沙要精准把握住机遇，适时巧妙在融入大湾区的发展。

融入大湾区，长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家战略方面，长沙是“一带一路”战略重要节点城市、长江经济带重要中心城市之一，特别是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湖南湘江新区三大国家级战略平台迭加，长沙地位更加重要。

在交通区位方面，长沙是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京广高铁、沪昆高铁和即将建设的渝长厦高铁在这里“米”字交汇。黄花机场已开通国际客货运航线50多条，国际通航城市达43个，旅客吞吐量去年达2,527万人次，位居中部前列。开放平台日益完善，形成了多类型、多层次、多功能的口岸开放平台体系。

在产业支撑方面，长沙逐步形成了新材料、工程机械、食品、电子信息、文化创意、旅游、汽车及零部件7大千亿产业集群，生物制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电子商务、现代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

在开放发展方面，建立了海关、国税、信保等部门密切协作的“大通关”机制，加强协同和信息共享，采取了联合查验等手段提高通关效率，货物通关时间缩短，通关环境日益优化。目前长沙市初步形成了多类型、多层次、多功能的口岸开放平台体系。

在政策支持方面，长沙市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对加工贸易企业开展技改研发、物流、搬迁、厂房、人员培训、利息支出、设备购置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长沙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临空经济示范区的交通物流条件，对企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深圳市恒达航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海洋说。他们在今年“港洽周”期间与长沙签订合作项目，准备投资1亿元，引进10条生产导航仪的进口SMT贴片生产线。投产后，第一个年度预计可实现外贸自营进出口额3亿美元。

长沙之谋：撬动“长株潭”

2019年5月，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在长沙拉开帷幕，24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主机企业，14家世界500强配套件企业，共计1150家工程机械企业将携最新技术成果、智能化新一代产品亮相展会。

作为东道主，内陆城市长沙究竟有何魅力，得以吸引全球工程机械精英汇聚于此？

2018年实现产值1,600多亿元，中国唯一拥有4家世界工程机械50强企业的城市，产品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4家企业获“国字号”智能制造示范企业项目。

这只是长沙精准把握、精细谋篇布局之一斑。

2017年，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胡衡华率长沙党政代表团赴株洲、湘潭考察，三市党政代表团实现了“互访”，达成了高质量推动长株潭三市协同发展的共识。

自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首届联席会议召开以来，至今已经召开了三届。事实证明，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逐步解决，一些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实事也正一件件稳妥落地。

今年4月，在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三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就长株潭一体化实际进展作成果发布。“半小时通勤圈”“潇湘一卡通”“优质教育资源接轨”以及三市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多个重点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

的合作，实施了一系列创新务实的举措，使得百姓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

首先是交通一体。长株潭三市再度扩大“交通网”，“三干两轨四联机”就是三市一体化发展的基础硬件。

记者了解到，目前遥感卫星图像收集、线路踏勘调查、交通量调查分析等前期技术工作已全面完成，形成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文本。潭州大道长沙段快速化改造与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2019年完成前期研究设计，2020年开工建设；潇湘大道—滨江路连接线工程2019年12月底建成通车；湘潭大道—铜霞路连接线2019年完成前期研究；其余线路均计划2019年9月开工，2020年底建成。下一步，三市将加大统筹推进力度，加速打开长株潭“半小时通勤圈”的交通融城新局面。

其次是服务融城。三市已分别完成社保卡制卡690万张、325万张、245万张，共计1260万张，并已提前实现异地就医实时结算、社保关系实时转移。下一步，将抓紧推进人社数据整合共享、业务经办系统对接改造的立项工作，实现三地业务办理同城化，改变老百姓跨城办理业务两头跑的局面。

长沙作为“试验区”的主要城市，具有绝对领先优势，而三市联合，其优势绝无仅有。一区连三市，三市中心城区彼此距离在40公里以内，高速、高铁、轻轨、城市主干道基本实现无缝对接，这样的经济地理形态在全国绝无仅有；产业配套完整度绝无仅有。以汽车产业为例，长株潭有多家整车企业，配套企业近300家，形成了研发、制造、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一般零部件采购在长株潭地区就可完成。国家级产业园区集中度绝无仅有。区域内有国家级新区—湘江新区和长沙高新区、长沙经开区、宁乡经开区、浏阳经开区、望城经开区这5家国家级产业园区，各个园区首尾相连，围绕城区形成了一个不间断的产业圈，在全国绝无仅有。除此之外，还有省级园区9家。

长沙还拥有各类科技创新（含国家与地方联合）平台1,000多个，省（部）属科研机构80多家，国家级创新平台90多个，省级创新平台600多个；拥有各类孵化器、加速器30多个，其中国家级孵化器14个，孵化总面积400多万平方米，在孵化企业2,500多家。拥有一批国家级科研机构，有11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4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4家国家级工程实验室，以及649家省级研发平台和528家市级研发平台，还包括众多院士专家工作站、产业联盟。

长沙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打造国家智能制造中心，抢抓“互联网+”行动的机遇，加快构建智能制造服务体系、产业链条和人才高地，推动长沙制造业率先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升级，率先建成智能制造强市。

为此，长沙顶层设计了“三步走”战略，最终达到全市制造企业基本实现智能化。目前，长沙已基本成为“产业智能化先行区”、“智能产业化引领区”和“高端智能装备知名品牌聚集区”。

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的大湾区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可谓是商机无限，发展前景广阔。泛珠三角区域的多个省市都已经跃

跃欲试，意在主动出击，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

“抢占先机，抓住商机”对于长沙来说，早在谋定之中。作为“‘四都’之城”的长沙，与粤港澳进入到了“3小时旅游圈”，其合作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湾区建设中，无论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全球创新高地、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还是共建大湾区经济共享圈，优质生活圈，长沙都将承担重要角色。

长沙之智：科创为龙头

长沙是一个懂得享受的城市，长沙人更懂得享受质量生活。这要得益于长沙的地理坐标。北纬28° 12'，东经112° 59'，这是长沙的国际坐标系。地球的北纬28° - 30° 附近区域，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长沙拥有世界文明。

从地理位置看，湖南的圆心点并不在长沙，从行政区域和经济圈来说，长沙则是湖南的“0公里处”。打开地图，以长沙圆心，以500公里为半径，覆盖了约3.7亿人口；以1,000公里为半径，可覆盖7亿人口。

7亿，中国一半的人口在以长沙为圆心的半径内，区位优势可谓得天独厚。而且，长沙交通便利，水陆空立体交通网基本形成，目前已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50多条，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京广高铁、沪昆高铁、渝厦高铁等多条高铁在省内交汇，特别是充分发挥长沙到香港“早发夕回”的交通区位优势，全面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共建共享7,000多万人甚至7亿人的高铁旅游大市场。

2018年，湖南提出“一区”“一圈”构想对接大湾区，“一区”即长沙空铁经济示范区，“一圈”即长株潭高新技术经济圈。自此，长沙便开始精细布局，积极探索省际协作联动机制，打造超一流“长沙空铁经济示范区”。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是全国第七个、中南第一个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是中部地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并打造空铁经济示范区的首选区域，也是中部地区最具经济价值的走廊空间，在区位交通、产业基础、科技创新和生态承载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能够承担起“内陆发展第一腹地”的关键角色。

为应对大湾区经济的崛起，当前，长沙市成立了以市长任组长的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和同步推进发展与管理。下一步，长沙还将在泛珠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和泛珠区域省会城市市长联席会议的基础上，探索省际协作联动机制。

目前，长沙市正在编制临空经济示范区发展规划，统筹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黄花综合保税区、国际会展中心、火车南站、磁悬浮等重点区域和工程，推进机场周边约40平方公里航空城控制性详规以及城市设计、交通、水电等专项规划。

同时，湖南正在开展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专题研究，制定省级层面专项政策，争取国家将长沙市纳入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并在自贸区申报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等方面给予支持。在市级层面，长沙市正在研究相关配套政策，如制定产业税收增量分成机制，设立临空、高铁、会展经济产业扶持专项资金引导基金，出台招商引资奖励办法和《政策清单》等；推进落实《泛珠三角区域口岸通关合作协

议》，深化开放合作。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关键在科技。就湖南而言，长沙是湖南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区，其中，长沙高新区是全球重要的工程机械制造基地，发挥长沙高新技术经济圈在湖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中的龙头效应，意义极其重要。

长沙市还将深入研究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差异和互补之处，主动承接大湾区外溢的高端制造、生产型服务等新兴业态转移，稳步运行“湘粤直通快车”，加强交通物流，缩短与粤港澳的距离。

有香港专家说，粤港澳大湾区是长沙走向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多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在长沙投资项目数量和投资额稳居第一。2018年，长沙引进粤港澳地区资金达到907亿元。同时，粤企在长沙投资额也居全国各省区市来长沙投资的首位。

与此同时，香港是长沙第一大出口市场。作为长沙最大贸易伙伴，2018年长沙对香港进出口22.7亿美元，同比增长34.1%。其中，出口22.5亿美元，同比增长33.5%；进口0.2亿美元，同比增长176.4%。香港也是长沙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2018年，长沙分布在香港的投资项目累计有11个，投资总额2,250.31万美元。

2018年，长沙获批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长沙高新区、黄花综保区和金霞保税物流中心三大核心产业园已形成引领。经省商务厅认定的跨境电商企业129家，涵盖在线线下通关服务平台、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物流服务商等，形成了跨境电商发展的强大“生力军”。

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经国务院批准建设的首批27个国家级高新区之一。有先进装备智能制造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包含移动互联网产业）、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六大产业集群。截至2018年底，长沙市移动互联网企业突破2.5万家，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第五城。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位于长沙市东部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的核心区。依托国家一类口岸黄花国际机场，全力打通“空中物流通道”。截止今年5月初，已与世界3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贸联系，与20个国家和地区有业务往来，区内注册企业总数已达340多家，2019年将突破500家。

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作为湖南省重要的开放型经济的公共服务平台，2018年金霞保税物流中心实现进出口额9.58亿美元。金霞保税作为长沙跨境电商综试区重点园区之一，建设长沙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规划建设湖南跨境电商产业园，构筑起强有力的产业集群。

“一区”“一圈”构想对接大湾区已成雏形。长沙正在迈入湾区经济时代。从智能制造之都到工程机械之都，从媒体艺术之都到国际美食之都；从历史文化名城到现代生态都市，长沙正在逐渐形成“智能都市、质量长沙”格局，而这正是长沙结合新时代、新要求，为抢抓大湾区建设机遇而正在探索或实施的战略任务和价值追求。

一个思想与艺术多元的“四都之城”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正在无缝对接粤港澳

大湾区，未来，长沙将以“创新长沙”为坐标，以创新为引领，以担当的姿态，融入大湾区，拥抱“溢出效应。”

探索改革

从“价格改革双轨制”看国企混改理念与逻辑

郑志刚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9年5月21日

35年前（1984年），张维迎教授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印发的《专家建议》中，以“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为题，提出了后来被称为“价格改革双轨制”的价格体制改革思想。我今天要讲的是“从‘价格改革双轨制’看国企混改的理念与逻辑”。在讨论受到国人普遍关注的国企混改的理念和逻辑之前，我想首先谈一谈我对“价格改革双轨制”的一些粗浅认识。

如果我们用两个标签来概括“价格改革双轨制”的特点，我愿意用的第一个标签是“增量改革”，即价格改革双轨制并没有由于引入市场轨，而立即抛弃传统的计划轨。而第二个标签是“渐进改革”，即通过双轨的采用，减少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阻力和利益格局改变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和震荡，经过一个实验和磨合过程，最终由双轨变为单轨。前一个标签事关改革内容的取舍，而后一个标签事关改革速度的选择。应该说，在这两个标签背后都体现的是改革的“务实主义”理念。

通过张维迎教授所倡导的“价格改革双轨制”，我们在价格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两种“失败的可能”。其一是在时机不成熟时，仓促之间进行“休克疗法”。东欧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验表明这种可能并非完全不存在；其二是“坐以待毙式”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误改革时机。因此，价格改革双轨制的核心在于坚持“改”和动态地“改”，期待从量变逐步积累到质变的“飞跃”，强调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其成功不是，也不会一蹴而就。

现在回到国企混改的理念和逻辑这一问题。我们知道，国企改革始终是中国4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核心内容。经过近几年的试点探索和实践总结，新一轮国企改革初步形成了在以下两个层面平行推进的改革方向。其一，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通过重组或新建国有资本投资营运公司作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面’，‘隔离’国资委和实体企业，由此实现从以往‘管人管事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化；其二，在经营实体层面，通过引入民资背景的战投，在股权结构上进行所有制的混合，形成股东之间力量的制衡和分权控制格局。其中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企混改。然而，围绕在引入民资背景的战投，实现所有制混合的国企混改问题上，近期出现了来自实践部门的一些不同声音，使得原本相对清晰的国企改革方向又开始变得有点模糊了。一些人认为，混改不是国企改革唯一实现形式，更不是“一混了之”；一些人更是明确地提出，“混合所有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

题”，“只有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力量方向的改革才是国企改革的关键”。

姑且不论国企改革四十年从承包制开始，经过职工股份合作制和企业集团部分控股公司上市等改制形式一路跌跌撞撞走来，就是四十年来所进行的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不就是希望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力量吗，但这又谈何容易呢？再美丽的口号，不如实际的行动。

最近我在FT中文网的专栏中发表了两篇关于国企改革的经济评论文章。第一篇的题目是《国企混改：只有“混”，才能“改”》，第二篇的题目是《国企改革：与其“并”，不如“混”》。大家将看到，在这两篇文章中我所强调的国企混改应遵循的理念和逻辑，与张维迎教授在35年前提出“价格改革双轨制”的理念和逻辑有很多一致和相似的地方。今天，我们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积极倡导和热心推动实践当年“价格改革双轨制”所遵循的理念和逻辑，也许这是对这种改革精神最好的传承和纪念。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今天国企混改所遵循的理念和逻辑，与当年“价格改革双轨制”的理念和逻辑是一致和相似的呢？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让我们首先从国企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谈起。概括而言，国企面临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不该管的乱管”的问题，即国企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未能有效分离导致的监督过度。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国企高管“一刀切”的限薪令。其二是“该管的却不管”的问题，即由于所有者缺位和长的委托代理链条，国企理论上应该交由董事会履行的管理层薪酬设计问题却没有人愿管或敢管，导致管理层激励不足，甚至激励扭曲。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被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证明的经理人股权激励计划在国有企业中迟迟得不到推行。当然，“该管的却不管”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不该管的乱管”所导致的。对于国企发展面临的这两方面问题，我们将看到，通过引入民营背景的战投的混改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甚至解决。首先，混改新引入的民营背景的战投作为国资新的制衡力量，形成主要股东之间的竞争关系和分权控制格局。这意味着，混改后的企业原则上不再是某一家股东的企业，而是“大家”的企业，需要大家（全体股东）商量着来。混改后的国企将由此形成一种自动纠错机制和权力制衡格局，可以一定程度上减缓以往国企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未能有效分离导致的监督过度问题。换种大家容易理解的通俗说法，混改后引入的战投类似于明媒正娶了的儿媳妇，婆婆即使想说三道四，也至少需要看一看儿媳妇的脸色，而再不能像以往对待从小养大的童养媳一样动辄呵斥。

其次，混改将使民营的盈利目标和国企保值增值目标有机统一在一起，在不同股东之间形成只有“合作”才能“共赢”的共识，共同自觉地推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化。既然“经理人股权激励”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如此诸多好处，而大家又是为了“共同的利益”（盈利）才走在一起的，那还有什么理由不积极主动推行呢？大家将看到，以往国企代理冲突下经理人激励不足，甚至扭曲的“该管的却不管”的问题由此迎刃而解。混改后的国企将有激励从本公司实际出发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实现经营机

制的转化，提升管理效率。

虽然国企混改目前还处在进行时状态，现在评价混改是否真正解决国企发展面临的“不该管的乱管，该管的却不管”的问题还为时尚早，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以下两个例子“管中窥豹”洞察未来混改可能带给国企的变化。一个例子来自已经初步完成混改的中国联通。中国联通混改完成后，BATJ和中国人寿等战投共拥有混改后的中国联通董事会8名非独立董事中的5名，创立了“股权结构上国资占优，但在董事会组织中战投占优”的所谓“联通混改模式”。请各位注意，即使在治理更为规范的国有上市公司中，又有多少公司在其非独立董事中是由非控股股东委派的董事占了大多数呢？更不要提那些尚未上市的国有企业。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先生在4月23日举办的5G创新峰会上表示，在混改后，中国联通无论思想、风气还是机制都发生了变化。

另一个例子是来自国有上市公司以“61.7%的净资产”却创造国资全部“87.6%的利润”的事实。2018年12月12日，在2018央视财经论坛暨中国上市公司峰会上，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先生透露，“有65.2%的总资产和61.7%的净资产已经进入上市公司，有61.2%的营业收入和87.6%的利润总额来自于上市公司”。大家知道，通过上市，这些国有上市公司事实上已完成以“社会资本化”为特征的“混改”。因此国有上市公司以“61.7%的净资产”却创造国资全部“87.6%的利润”的事实很大程度上与借助上市完成的混改，以及由此带来的经营机制的转换有关。上述的两个理由和两个例子共同构成我在我的文章中强调，“国企混改，只有混，才能改”背后的论证基础和经验事实。

在理解了国企混改“混”与“改”的关系后，我们现在可以回答，为什么说今天国企混改所遵循的理念和逻辑与当年“价格改革双轨制”的理念和逻辑是一致和相似的问题了。我们看到，国企混改与“价格改革双轨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一致性。

首先，在改革切入点的选择上，二者都是通过首先引入未来容易形成竞争关系的外部力量。我们看到，价格体制改革双轨制中的“市场轨”的存在，不仅成为评价计划轨低效率和价格扭曲的基准，而且构成计划轨的直接挑战。而在国企混改中，盈利动机明确的民资背景战投在混改中则再次充当了竞争者和制衡者的角色。

其次，在改革哲学上，二者都希望从量的增减逐步实现到质的飞跃，从量变到质变。在价格改革双轨制中首先是从市场定价多一些和计划指导价格多一些的问题，逐步过渡到完全市场定价；而在国企混改中，从“一股独大”和大股东“大包大揽”到“董事会层面战投占优”（联通模式）和民资控股（天津北方信托模式），这种量的增减带来的质的飞跃在逐渐显现。

第三，在改革内容选择上，二者则很好地体现了“增量改革”的特点。当年价格改革双轨制，并没有从开始立即放弃计划轨，单纯建立市场轨，而是通过选择双轨制，形成一个过渡期，最终实现市场和计划的并轨；对于国企混改而言，新引入的民资背景的战投是以“混”的方式，而不是以“替”的方式发挥制衡作用和形成分权控

制构架。

第四，在改革速度选择上，二者都很好地贯彻了“渐进改革”的理念。如同价格双轨制改革并非激进的休克疗法一样，新一轮国企混改同样将通过“混”逐步形成股东力量的制衡，使国资从以往“管人管事管企业”逐步向“管资本”转变，并最终实现建立现代法人制度和规范治理构架这一“改”的目的。

正是基于上述四方面的理由，我倾向于认为，今天国企混改所遵循的理念和逻辑与35年前张维迎教授所倡导的“价格改革双轨制”的理念和逻辑具有一致和相似的地方。

在一定意义上，今天我们积极鼓吹的国企混改以“混”促“改”的理念事实上是当年价格双轨制改革从“双轨”最终过渡到“单轨”的理念的传承和延续。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企改革实践中，我们还观察到另外一种看似与“混改”思路并行的国企改革思路。那就是通过并购重组实现的国有资源的重新组合和国资产业布局的优化。其中典型的例子如南车和北车于2015年合并为“中车”，宝钢和武钢于2017年合并为“宝武”，中核与中核建于2018年合并为新的中核等。相对于前面讨论的“混”的国企改革思路，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一种思路称为“并”的思路。我们看到，“并”的思路对于切实推进对于国企改革至关重要的混改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干扰性，甚至误导性。在国企改革究竟应该“并”还是“混”的问题上，我们始终强调，与其“并”，不如“混”。

我们之所以强调国企改革“与其‘并’，不如‘混’”，主要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担心。其一，除了本身容易招致垄断质疑，甚至卷入一些国家启动的反垄断调查，“并”所形成的局部垄断产业结构会带来暂时高额（垄断）利润，掩盖了国企真正需要解决的体制转化问题，从长远看不利于国企经营体制的转化和管理效率的提升。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2010年由天津钢管、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天铁冶金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冶金集团有限公司等4家国有企业合并组成的渤海钢铁。在财务并表后的2014年，渤海钢铁一举进入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排名第327位。2015年排名进一步从327名上升到304名。但从2015年底以来，快速扩张后的渤海钢铁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105家银行金融机构卷入的负债金额总计高达1920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很多国资背景的煤炭、钢铁、有色等500强巨头，绝大部分是通过整合而来的，而“并”与贸易，直接虚报等被一些评论者认为是“500强速成指南”中的重要工具。因而“并”其实并不是解决国企发展所面临问题的根本途径。

其二，被“并”暂时遮掩起来的国企经营体制转换问题最终依然需要依靠“混”来解决。对于渤海钢铁债务危机的化解，首先是2016年4月把经营状况相对尚好的天津钢管从渤海钢铁中剥离出来，而钢铁主业则考虑引入民资背景的德龙钢铁做战投，进行混改。我们看到，渤海钢铁在经历了“并”带来的短暂繁荣后，不得不重新回到通过“混”，最终实现“改”的国企改革思路上来。这里让我们大胆猜想，如果当初中国联通不是通过引入BATJ等进行混改，而是走与中国电信或和中国移动等的合并之

路，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又会是怎样的联通呢？

因此，对于正在推进的国企改革，我们始终强调这样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国企混改，“只有‘混’，才能‘改’”；第二句话是，国企改革，“与其‘并’，不如‘混’”。我们看到，其背后的理念和逻辑与35年前张维迎教授所倡导的“价格改革双轨制”的理念和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引入竞争，积极推进，务实改革。如果说30多年前在价格改革过程中由于采取双轨制的改革策略和务实理念最终使中国的价格改革获得成功，我们今天也十分期待国企混改能够通过采纳与当年价格改革双轨制类似的理念和逻辑，使国企改革最终获得成功。

粤力推科创补湾区短板

王珏 香港《文汇报》2019年6月4日

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马兴瑞昨日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广东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大机遇，粤港澳三地将团结协作，努力把大湾区建设成世界级的城市群和一流的湾区，与美国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的东京湾区相互促进，大大提升竞争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他也坦承，“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在原始创新方面比我们要强，这也是我们的短板”。他透露，广东将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对包括港澳特殊人才在内的科技人员给予一定税收优惠。

国新办昨日上午举办新闻发布会，邀请马兴瑞，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傅华和广东省副省长张虎介绍广东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

五方面推动大湾区建设

马兴瑞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广东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大机遇，下一步，将在五个方面大力推动：第一，以规则相互衔接为重点优化营商环境，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便捷有序地流动；第二，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三，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第四，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香港和深圳的莲塘/香园围口岸、澳门到珠海的粤澳新通道等都将在年底建成，此外还将推进高铁、港口、机场群的协调发展；第五，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提供良好条件。

马兴瑞坦承，“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在原始创新方面比我们要强，这也是我们的短板”，不过他指出，我们有改革开放4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年打下的基础，港澳有几所世界一流大学，与广东实体经济的创新能力相结合，将有助于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特别是国家各部委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比如建设重大的科技基础设施、大科学装置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实验室等，另外将对科技人员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比如港澳特殊人才到广东，正在推动按港人港税、澳人澳税的政策解决。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

马兴瑞表示，广东将进一步积极布局创新体系建设，坚持独立自主创新道路，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加大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包括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重点实验室等，搞关键技术攻关和基础研究，成立广东基础研究的队伍开展9大关键领域的技术攻关等，此外为人才提供宽松的环境，包括国内外专家都有一些特殊政策，“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特别鼓励企业在全球配置科技资源，不能关起门来，像华为就是全球配置科技创新资源的集团公司，要用好全球的人才。”

在产业方面，马兴瑞透露，广东将率先发展4K超高清视频产业，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率先发展工业互联网，此外还将大力发展移动通信产业，加快5G网络建设，今年将在深圳布局商业化基站以推动5G发展。

经济广角

“数字经济”发展隐忧浮现 数据安全亟待“上锁”

新浪网(台湾) 2019年5月30日

随着大数据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日益加深，数据安全问题逐渐凸显，个人信息泄露、网络诈骗给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威胁。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如何给数据安全“上锁”成为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与会专家讨论的焦点。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伴随安全隐忧

如今，大数据全面融入社会经济、健康医疗、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1/3，达到34.8%，占比同比提升1.9个百分点。本届博览会发布的《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显示，当前全球贸易已经有50%以上实现了数字化。

“2018年1月印度国家身份认证数据被攻击，近11亿人的信息被泄露出来；同年11月，万豪国际旗下喜达屋酒店被黑客入侵以后，客房预订系统也被破坏，5亿人详细数据遭到了泄露……”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王伟平介绍。2018年全球仅公开的数据泄露事件就超过6500起，其中涉及人数超过1亿的就有12起。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集聚开发应用加大了个人隐私泄露、泄密的风险。此外，大数据本身也在帮助黑客来进行相应的数据分析。

加快数据分层分级保护

5月28日，国家网信办发布《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就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网路空间的合法权益，保障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安全，征求广大网民意见。

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颁布实施后，2018年《个人信息保护法》被列入五年立法规划，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被列入年度立法规划。

与会专家指出，全球数据爆发增长、海量集聚，使越来越多依赖数据的政府部门、企业面临传统的信息安全问题。由于大数据服务政府治理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集中化的数据平台部署方式和大规模数据的管控、调度模式面临着许多新的安全挑战和风险。王伟平说，数据安全不纯粹是技术问题，它是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企业政策和技术相结合的一个体系化工作。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副所长郭莉认为，应该建立合理适度的数据保护法律制度，建立权责明晰的安全责任机制，既要避免法律缺失，数据被滥用，也要避免防护过度，抑制“数字经济”发展。

“应加快数据分类分级分层保护，鼓励政府部门和企业定期开展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和自查，做好数据安全监测预警，进一步强化企业自律和社会责任。”全国政协常委周汉民表示，同时还应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切断数据交易的黑、灰产业链，严厉打击非法泄露、窃取、盗用数据的行为。

全面提升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与会专家指出，应建立管理、技术、运营、监管四个维度，平台、数据、应用三个层次的全方位数据安全防护体系。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望佳认为，新的安全保护方案应围绕整个数据链条，贯穿于采集、传输、存储、处理、交换、销毁的数据生命周期，同时应在满足“第三方独立”要求下，提供恰当的“安全解决保护能力”。

要突破和掌握大数据安全治理的核心关键技术，着力推动在大数据背景下的技术创新。通过加大研发和创新力度，提高数据安全预警、溯源能力，以及应急和处置能力。加强数据防泄露、防窃取、数据加密等技术的研发。

北京海泰方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柳晶认为，密码是整个网路安全里面一个比较核心基础的保障手段，可以称之为网路安全的基石。在整个网路安全、防护过程中发挥着非常积极重要的作用。可以解决可信身份识别、信息完整性保护、机密性保护、信息安全隔离以及抗抵赖性等问题。

王伟平等专家指出，数据安全是相对的。建立以数据为核心的安全防护体系已经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

数据安全治理的目的是让数据安全地利用，未来以数据为中心可能是构建安全防护体系的一个主要趋势。这个工作需要国家、行业、企业、科研机构和个人多方协同，从产业政策、国家政策到关键技术、组织实施策略，共同来保障数据安全，助力数字经济发展。

数据安全人才短缺的现象也是与会专家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如何加快培养政企机构急需的安全分析型人才。公安部网路安全保卫局总工程师、贵州大数据及网路安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郭启全等专家分析，应加快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培养，加快培育安全企业。

制造业PMI新低经济下行压力未减

朱辉豪《香港商报》2019年6月1日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4%，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创3个月新低，并为同月历史最低值；非制造业PMI为54.3，同上月持平。受访专家认为，中国5月PMI数据回落明显，主要与近期中美争端升级、外部需求疲软等因素有关。预计短期内政策层面或采取更多促增长措施来稳定经济和提振内需，未来PMI可能平稳运行。

PMI数据全面回落

从企业规模看，5月大型企业PMI为50.3%，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仍高于临界点；中、小型企业PMI为48.8%和47.8%，分别比上月下降0.3和2.0个百分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和供货商配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点，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低于临界点。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仍位于临界点之上；新订单指数为49.8%，比上月下降1.6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下。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5月制造业PMI重回荣枯线并为历史同期最低，新订单指数为主要拖累。“根据我们测算，新订单对PMI回落0.7个百分点的贡献率为64%。具体来看，5月供需回落，而外需更弱。”

潘向东指出，生产指数回落0.4个百分点至51.7%，增值税减税扰动结束，但需求端疲弱依旧制约生产。5月新订单指数降至49.8%，重回荣枯线之下，需求回落幅度远大于生产，导致产成品库存被动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大幅下降至46.5%，为历史同期最低，可见外需是主要拖累。

贸易摩擦加剧经济下行压力

数据显示，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为47.0%，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下，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量回落。新出口订单和进口订单均大幅回落，分别下降2.7、2.6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特约分析师张立群分析，5月份PMI指数继续下降，且降幅扩大，表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3月份提高到荣枯线以后，5月份PMI指数重新回到荣枯线以下，表明经济企稳基础尚未建立。

“对于外需回落，海外经济放缓影响趋势，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则加快数据下行斜率。”潘向东说，制造业与外部环境关联很大，贸易摩擦升级固然影响出口企业预期，然而拉长时间看，之前中美贸易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但关税没有取消并已经对两

国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出口企业的预期没有实质性逆转。

制造业PMI或将持续承压

数据还显示，2019年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3%，与上月持平，表明非制造业总体延续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3.3%，比上月微落0.1个百分点，表明中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张立群表示，综合分析，目前形势下行压力较大，宏观经济需求不足问题比较突出。应该进一步做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工作，努力扩大内需，尽快提高应对外需波动冲击，稳定总需求，稳定经济增长的能力。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整体来看，5月PMI整体较弱，尤其是制造业PMI继续回落，凸显了外部环境变化、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下，外需下降的冲击。考虑到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主要经济体均存在较大下行压力，预计未来制造业PMI或将持续承压。

潘向东指出，若未来贸易摩擦能够阶段性缓和，随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政策效果的显现，PMI可能平稳运行。他表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短期政策调整应与长期改革开放相结合，以保障经济的平稳发展。

科教文卫

“互联网+”医联体 让医疗资源从“云端”落地

刘静 新浪网(台湾)2019年5月29日

作为一家有着近70年历史的妇幼医院，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济南妇幼”）如今年门诊量120万余人次，年分娩新生儿约两万名。相较以往的管理模式，济南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张运利说：“要拥抱互联网，突破围墙，敞开大门办医院。”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济南妇幼携手58家妇幼保健机构成立“济南妇幼联盟”，这次是传统医联体的“升级版”——“互联网+”医联体。

“互联网+”医联体通过构建区域信息“云平台”，利用区域妇幼信息平台，医联体内各级医院信息共享，实现就诊协同、检查协同、上下转诊、远程医疗等功能。现阶段，“互联网+”医联体是实现医疗公平和效率的最有效方法。“互联网+”医联体让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有了更便捷的平台和通道。

“在我们医联体内，孕产妇按绿、黄、橙、红、紫分级，高危妊娠信息系统与基层建册点互联互通，实现全围产周期分级管理。”张运利说，近3年高危孕产妇的比例一直为35%左右，医联体内的高危孕产妇都被纳入五色管理的体系中。

信息化建设为医疗安全布下了安全网，孕产妇按照分级在各级医院分娩，按照国

家规定，高危孕产妇“红色等级”必须在三级医院分娩。

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是分级诊疗愿景，是医改的重要方向。“互联网+”医联体为实现分级诊疗提供了数据基础。张运利介绍，建立“互联网+”医联体后，开放济南妇幼中心实验室平台，实现了联盟单位基层采血、物流配送、中心实验室检验、报告单网上提取等多项服务功能。

目前，济南妇幼将联盟内高危孕产妇管理、产前筛查及诊断、孕期管理与营养、新生儿救治等实现上下贯通，医疗资源从“云端”落了地。

张运利说，除了开放平台，济南妇幼医生将把基层培训、接收联盟内医生进修作为常态化工作，医疗扶贫是“互联网+”医联体线下的重要职责。

2013年来到济南妇幼当院长，张运利一直在探索做好妇幼健康“提前量”，“要认识到保健的重要性，这里说的保健不是指狭义的个人保健，而是群体或地区的大保健”。“国家花钱给新婚夫妇免费做婚检，为什么婚检率却一直在下降？我也做了些调研，发现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新婚夫妇认为检查的项目太少，没有意义。”他说。

今年4月，济南妇幼与济南市政府推出一个公益项目，双方各出一部分资金在济南市槐荫区试点进行“加强版”婚检，增加项目以吸引新婚夫妇参加婚检，项目仅成本就为800多元/例。

“以前婚检是不查男科的，这回把男科也列入。这一列就发现了问题，截至目前仅200多例样本，其中少精症、弱精症、无精症就占30%。当然，这个样本数还太少，不能说明问题。但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育龄夫妇需要借助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生育。这个现象需要我们全社会去研究。”张运利分析。

据介绍，“互联网+”医联体的建立，使平台聚合的大数据可以更好地服务公共卫生，为母婴保健相关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2018年，济南市免费推出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2019年，利用新生儿筛查新系统，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病种扩大到40种。位于济南市妇幼保健院的济南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负责全市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检测以及随访治疗，已建立起覆盖所有产院的新生儿疾病筛查信息系统。张运利介绍，“目前医院20年积累的样本有200多万个，我们一直在追踪和分析研究。”

他说：“我们要把互联网植入医院的各个环节，包括大数据，这很有意义。”

文旅融合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刘翊杨 香港《经济导报》2019年11期

第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文博会”）于5月16日在深圳隆重开幕。一年一度的文博会之所以让人期待与瞩目，正是源于它的专业性与广泛性，文化的守护与传承必须得到广泛的关注度，否则只能“养在深闺人未

识”。

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深圳文博会在现场搭建起一个时光走廊，穿梭于其中，人们将感受到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文化旅游的日新月异与飞跃发展，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积淀为新兴旅游形式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源。

本届文博会首设“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馆”，以“游中华，品文化”为主题，展示国内知名文化历史古迹、博物馆、创意主题公园以及精品旅游演艺内容，“文化+”业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以深圳为例，当地通过发挥高科技、滨海旅游等资源优势，推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使文化主题公园成为文化旅游的主要支柱。

科技融入打造沉浸式旅游体验

创意和科技的共同驱动为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更新迭代提供了支撑。在文化和旅游融合首次设立展馆之年，游客旅游过程中的参与性提升，质量消费要求带动企业产品研发和业态创新，科技发展助力文旅融合。

大数据在旅游市场的应用推动了旅游资源的整合。在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当中，中国旅游研究院负责人付先生表示，作为文旅部的重点实验室，中国旅游研究院近年来协同多家OTA公司对旅游大数据进行分析、供给，以驴妈妈、大众点评等为代表的平台利用自身庞大的用户群体在“文化+”、“旅游+”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比拟的作用。不论是大自然赋予的壮美自然资源还是人类劳动与智慧谱写的民俗文化都借助大数据得以充分发挥其价值。

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几块大屏幕聚焦了观众的目光，工作人员介绍，大家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平台化供给看到各地旅游景点的实时数据和状况，这为游客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提升旅游质量和质量。

而AR、VR技术也在改变着旅游的推广和消费模式。借助虚拟现实技术(VR)，公众可以看到平时难得一见的景观。游客体验、互动娱乐、游戏开发让观光游览向深度体验转变。在四川展馆当中，鼎米国际公司的全息投影技术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杜甫草堂、踱步于春熙路，即使没有去过成都的观众也于此时身临其境。

同时，还有多个展馆都配备了VR装置让游客体验，戴上VR眼镜游客可以穿越到千年之外感受汴河两岸盛况，可以穿梭到万里之遥的吐鲁番盆地赏美景食瓜果，虚拟现实技术正在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文创IP 不仅仅是网红

近些年，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让封尘在禁宫中的文物、书写在简牍上的文字逐渐走近大众视野，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当之无愧的“网红”。通过故宫文创让我们看到，文创IP已经成为认识体验传统文化的新媒介，并且为各地的旅游市场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本届文博会上，记者发现各展馆都充分利用本地特色IP作为游客认知目的地的最佳方式。在山东展区，最火爆的IP无疑是“孔子”。围绕这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

来自济南、青岛、曲阜的多家文创企业挖掘内涵、打造属于自己的孔子形象IP及其衍生品。在挖掘、传承、创新、转化传统文化资源方面的探索，正是文化创意产业朝着更加成熟和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孔子邮局”东临曲阜孔府，是全球唯一一处以孔子命名的主题邮局。在以儒学文化为主题的前提下，将发挥邮政资源优势与曲阜地方特色相结合，打造出的一个集邮政业务、文化品鉴、购物、休闲、在线活动于一体的全新邮政综合服务平台。“孔子邮局”带来展示的“孔子”展品身穿湖蓝袍服，白眉笑眼作揖，一改平日在书中、影视剧中正襟危坐的形象，变得憨态可掬，现场受到成年人与小朋友们青睐。

徐州展馆作为一个市级展馆，面积虽不大，却是别样雅致。古青铜器、汉代玉器等等，以往深藏在博物馆的文化瑰宝化身为各种设计元素出现在精美的笔记本、杯垫、手机配件、丝巾中，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工艺相结合，既有温度，又有历史。当游客拿起一件展品细细打量时，积淀已久的江淮文化跃然指间。

传统工艺是文化旅游的灵魂

数千年文脉涵养了泱泱中华，传统工艺是文化的灵魂。工艺美术与旅游融合发展，拓展了旅游发展新途径，而历史文物的修复与再现，则能够丰富、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在游览展会之时如果细心观察，各展馆几乎都有一位手艺人静坐于一隅专注于自己手中的作品。安徽展馆展厅当中，几条肥硕的鱼被手艺人涂满颜料小心翼翼地放置于特殊纸张上，同时用细软笔刷将二者紧密贴合，鱼拓的基本雏形就可以完成了。中国鱼拓协会张会长十分热情的说道，鱼拓本身是中国上千年的传统工艺，曾一度流传到日本而中国本土却濒临失传。现今中国掌握鱼拓工艺的手艺人不过百位，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给予关注。

文博会现场摩肩接踵、热闹非凡，但置身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展厅中却有别样体验。在展厅中间区域，茶几、竹床、棋盘、条案等构成一处处复古生活场景，观众可坐在其中休憩。中国文传集团的设计理念向观众传达的已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多地是让传统文化不再孤立于现代文化之外，文化与生活实现真正的融合。

5月20日，文博会顺利闭幕，本届文博会汇集10万多件海内外文化产品、6,000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显示出在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大背景下，广大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进一步提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本届文博会现场考察时指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人文资源是旅游的核心资源，必须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新时代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机遇难得、大有可为。

海口旅游拓国际朋友圈

吴军晖《香港商报》2019年6月12日

昨日，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党组书记王如龙在第33届香港国际旅游展期

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该局正在积极抢抓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大历史机遇，不断提高海口旅游的知名度和世界能见度，扩大海口旅游的国际“朋友圈”，期待今后更好地与香港各界加强合作，助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入境游客激增 国际航线增多

据统计，2018年海口美兰机场运营国际及地区航线47条，依托59国入境免签、离岛免税提额等利好政策，海口完成了东盟十国全覆盖的航空市场开发任务，境外旅客吞吐量达114.85万人次，同比增长28.9%，接待入境过夜旅客26.13万人次，同比增长43.62%。

王如龙表示，2019年，海口力争开通前往巴黎、柏林、迪拜、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大阪的航线和新开东南亚国家主要旅游目的地航线，初步形成覆盖东南亚，联通澳洲、欧、日韩的区域性航空枢纽。

同时，按照“航线开到那里、宣传促销就做到那里”的原则，通过举办旅游推介会、投放旅游广告、参加组团推介会等，实施精准营销，宣传海口旅游形象、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提高海口的知名度和世界能见度，扩大海口旅游的国际“朋友圈”。

他表示，诚挚欢迎香港等主要入境旅游市场客源地旅行社、新闻媒体访问海口，体验美好新海口的旅游新风采，新变化。

内外兼修助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王如龙表示，香港是海口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将积极借助香港国际化平台，共推“一程多站”旅游联合促销、共同举办或互相参加双方旅游节庆，推进两地旅游、文化、体育和会展领域合作，吸引更多欧美高端游客经香港中转前来海口，更好推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他指出，海口还将利用好自贸区（港）的邮轮旅游、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优惠政策，与丽星邮轮、嘉年华邮轮、诺唯真等国际邮轮公司保持沟通，拟开通海口至越南、海口至菲律宾等泛南海邮轮旅游航线，争取海口港列为维京邮轮访问的亚洲港口之一。

“与此同时，我们也将苦练‘内功’，深耕海口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优势，加快骑楼老街、五公祠、海瑞文化公园等改造活化提升，积极发展沙滩运动、帆船帆板等大众海上休闲体验项目，擦亮节庆赛事品牌，推进美国六旗集团山水文园大IP综合体建设，打造具有独特产品体系、独特文化质量、独特风貌品牌、独特生态环境的海口旅游示范区。”王如龙表示，“我们也将认真借鉴港澳旅游诚信管理先进经验，建立旅游行业诚信体系，让游客来的放心，玩的开心，走的顺心，留的安心，再来舒心。”

干农活正在变得更“聪明”

马来西亚《亚洲时报》2019年5月27日

5月下旬正是天津小站稻的插秧时节，然而在天津西青区王稳庄镇的中化农业天津小站水稻智慧农业示范农场里，今年的插秧却跟往年很不一样。

一台插秧机正在一片平整的水稻田里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一株株秧苗被整齐地插入稻田中，仔细看去，你会发现这台插秧机上没有驾驶员，所有作业都是全自动完成的。“这就是中化农业在智慧农业领域采用的新技术——无人插秧机。相比传统插秧机，可以节省人力成本，并且插秧作业效率更高、质量更好。”中化集团农业事业部首席信息官沈冰说。

无人插秧技术是正在蓬勃兴起的智慧农业技术成果之一。智慧农业就是将物联网技术运用到传统农业中，运用传感器和软件通过移动平台或者电脑平台对农业生产进行控制，使传统农业更有“智慧”。除了精准感知、控制与决策管理外，智慧农业还包括农业电子商务、食品溯源防伪、农业休闲旅游、农业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内容。智慧农业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还可以转变农业生产者、消费者的观念和组织体系结构。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高万林认为，中国智慧农业近年来发展迅猛，已经在产供销各个环节扬帆起航。

智能农具的“十八般武艺”

4月20日至5月30日，第20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在山东潍坊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举办。在这场持续时间超过1个月的博览会上，智慧农业的新技术让中外宾客们大开眼界。

“提高蔬菜的产量和性能，需要相关的机器设备节能降耗提高效率。”南京以斯福地农业科技公司技术负责人刘志鹏说，他们公司的水肥一体化设备通过精确控制灌溉流量和频率，使水肥基本保持在作物根部30厘米深的范围内，可有效减少水肥流失，“在节水60%的同时实现10%到20%的增产。”

寿光金鹏农业设施装备公司不仅展出了12款大棚卷帘机，还推出了卷帘机性能全方位检测的设备。“卷帘机可以大大减轻种菜的劳动强度，还能早拉晚放，增加光照时间，提高作物品质和产量。”公司相关负责人朱珊说。

在大棚设备方面，本届菜博会不仅展示了日光温室、钢架梁大拱棚、薄膜连栋大棚等，更有寿光康顺农业科技公司推出的新型智能无骨双膜增压大棚。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博仁工贸公司展出了专业生产的“滚筒式”蔬菜花卉播种流水线、半自动播种机、基质搅拌机、基质解压机、半自动蔬菜嫁接机、育苗车、可视

压穴板等育苗装备。其中“滚筒式”蔬菜花卉播种流水线可完成从基质装盘到压穴、精量播种、覆土、浇水、输送的一系列流程。“这套设备可以对多种异形种子进行播种，其中辣椒种子的准确率可达到97%以上，每小时可播种1000至1200盘，相当于45个人的工作量。”公司副总经理陈佳峰说。

多款蔬菜播种机械设备也是本届菜博会的一大亮点。丹麦品氏集团的小型轻便蔬菜穴盘播种机以气泵为动力，通过吸种针头吸入蔬菜种子的方式进行播种，每小时可播种200盘。日照镭沃自动化设备公司的全自动精密穴盘播种机通过铺土、压实、打孔、播种、覆土的工作流程，可实现每小时300盘一穴一粒的精准播种。

给“农忙”帮了大忙

尽管还未到采摘季节，云南省蒙自市西北勒乡的苹果种植户李忠福仍然坚持每天到自家的“忠福果园”走上一圈。“5月份，苹果树已经开始挂果，适当的疏果可以让苹果长得更好。”李忠福在果园里的一举一动，正被一台旋转式监控记录着。高清的录影数据同步上传到离果园不远的机房里，通过网络传输直达处理系统，经过后台的处理和录入，这条数据将成为追溯“李忠福苹果”的直观依据。

大数据信息手段的介入，将为2019年出产的每一只西北勒苹果打上一个专属的二维码，这是“苹果身份证”，消费者通过扫描二维码，不仅可以在移动端上直接追溯到苹果的产品特征、环境指数、地块信息、质检报告等，还可以直接观看苹果的种植过程。据了解，自动化、智能化的农机具成为了今年春季生产的亮点，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便利。

春耕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郊外的几十万亩农田里，除了一辆大型智能播种机正在播种棉花籽，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竟然看不见一个农民劳作的身影。在现场，一辆辆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多功能一体化无人驾驶精量播种机，正按照预先设定的播种线路，将一粒粒棉种精准播种到位。种地不用人，全程机械化，“智慧春耕”的出现正在让“农忙”变得不那么紧张忙碌。

“智能化农机帮了大忙，省工、省时、效率高！”近日，在河北省磁县南来村种粮大户赵运生的麦田里，一台无人驾驶的植保机器人在遥控器的指挥下，张开了7米长的双臂，灵活自如地行走在麦田之间，14个喷头将农药均匀地喷洒到田里。赵运生说，这台机械1次走过就完成了3个畦垄小麦的杂草防治。

“现在农民购买的农用机械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传统大宗机械，如旋耕机、插秧机、收割机，这类机械的使用周期为3到5年。另一类是近几年正在推广的科技含量高的新型机械，如无人植保机，使用周期为5年左右。”湖南锦绣千村农业专业合作社董事长龚佑琼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随着集中连片农田改造、适度规模经营的逐步推进，农用机械使用数量会逐步提高，农用机械的装备水平也会提高，农业综合效率会逐步大幅提升，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代农机在春耕中的广泛应用，为今年农业全程机械化提供了良好开端。根据农

业农村部发布的消息，今年，国家会继续强化科技装备支撑。中央财政计划安排180亿元农机购置补贴；支持农机深松整地1.4亿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有望达到400个。小麦、玉米、水稻三大主粮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中，把“农机能下田”作为重要目标，促进田块小并大、陡变平、弯变直；支持丘陵区开展农田“宜机化”改造。同时，创新推动农机具共享共用，更好服务小农户

"互联网 农业"势不可挡

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高万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我们搞智慧农业，首先实现数字化，然后把它变成信息，因而智慧农业不能只是自动化这类数据的堆砌，而是建立在对数据的分析运用，智能机械化和物联网是智慧农业必不可少的左膀右臂。”

不仅如此，智慧农业这块大蛋糕还吸引了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关注，包括百度、阿里、腾讯、京东等国内互联网巨头也都加快了在智慧农业领域的布局。

雷宗雄已经在阿里云工作了4年半，工程师出身的他从2018年2月开始跑起了养猪场。雷宗雄参与的是阿里AI养猪项目，通过构建AI算法，实现“猪脸识别”，从而帮助养殖户随时随地对动物的健康状态进行管理。雷宗雄介绍，把AI大规模用到产业中来辅助养猪，在全球都是首创性的。阿里如今已经做出了7套算法，在多家千头规模以上的猪场使用。阿里也成为国内最早布局智慧农业的巨头之一。

与此同时，国内另一家互联网巨头腾讯也参与到智慧农业的竞争中来。罗迪君是腾讯AI Lab的智慧农业技术侧负责人，2018年，他们的团队在荷兰一场黄瓜温室种植比赛中取得了AI策略第一、总分第二的成绩，这也是腾讯在智慧农业上的一次成功试水。

罗迪君深有感触地说：“智慧农业本身的整个构想是立足于提升粮食生产效率，也就是用尽量少的资源，比如能源、水，去生产尽量多的粮食。现在我们还是在基础研究阶段，我不敢说这是一个布局的重点，但是我们应该不会在AI农业这块缺席。”

中国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已成常态化趋势

美国 侨报网 2019年6月7日

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近日透露，目前中国有780万人返乡下乡开展创业创新。他指出，“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已成常态化趋势。”

从被迫外出到主动返乡

返乡实在不是一个新话题，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选择本地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不断增加。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在农民工总量中，在乡内就地就近就业的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比上年增加103万人，增长0.9%；到乡外就业的外出农民

工17,266万人,比上年增加81万人,增长0.5%。

是因为就业机会少了?目前来看,中国就业形势依然向好。3月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7,651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10万人,增长1.2%。

重庆为之情服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工郑美说,由于本村过去并没有什么产业发展,家中的几亩地只能“勉强吃饱肚子”。所以才选择通过劳务输出的方式去到江浙等地务工。而在重庆市卫健委扶贫集团的支持下,重庆市黔江区金溪镇通过引进外地办厂的本村人士,于2019年1月在金溪镇成立一家服饰有限公司。郑美便是在过年回家看到该厂招工信息后决定返乡。

各地大力发展产业

通过走访四川广元苍溪县、巴中市巴州区,以及重庆黔江区、秀山县等多地发现,在返乡创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的背后,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农业农村稳定向好发展的大背景,同时也离不开随着脱贫攻坚政策不断推进,各地方大力发展产业所作的贡献。

比如巴州区大力支持培育家庭农场。鼓励有一定规模的种养大户、返乡农民工等创办家庭农场,开展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目前全区已培育家庭农场307家,为当地村民脱贫增收提供有力保障。

黔江区通过培育致富带头人带动贫困民众创业就业,探索创新“三三三”模式,发展致富带头人400人,领(创)办企业136个,2018年回引农民工7,055人,其中返乡创业1,167人,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4,500多个。

返乡后,有人打工有人创业

有人依然是打工,只是这一次,拿的是家乡发的工资。21岁的梁舒育自小因脑瘤导致左手残疾。2018年5月,梁舒育回到老家苍溪县,经人介绍去了舒之恒鞋业有限公司,由于其身体的特殊情况,工厂为他安排了粘贴鞋盒等较为轻松的工作。如今,梁舒育的吃住不仅由工厂承担,每月还可以领到1,800元的工资。

也有人选择返乡创业。苍溪县黄猫垭的罗洪过去一直在成都经营石材行业。2014年,当地政府号召外地本村创业人士返乡发展,罗洪便是其中一个。返乡后的罗洪成立了四川省黄猫垭农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流转整理土地3,000多亩,建成了黄猫垭现代农业观光园。种植了枇杷、红桃及各类观赏花木,并完善了基础设施配套。园区采取“公司+农户”、“土地租金+股金分红”的模式运行,带动全乡贫困户132户、572人通过土地出租、园区务工,实现年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罗洪表示,如今不仅有外出务工的本村村民返乡,还有不少外地的毕业大学生来到黄猫垭发展,在其公司从事电商等渠道的销售工作。

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就显示,2018年,通过返乡下乡人员的创新创业,带着农民干、做给农民看、帮助农民赚,创办的经济实体带动农户经营收入平均增加67%,采取订单方式带动农户的占到55%,向农户返还或分配利润平均达500多元。

“互联网+农业”让机收更高效

香港 中评网 2019年6月15日

时下，河南8,600万亩小麦正陆续收获，中原麦区“三夏”生产热闹繁忙。在河南洛阳市的河南省智能农机创新中心，2万多台农机被接入了互联网平台，农机跨区作业的轨迹、机收面积和农机位置等信息一目了然。

“我们开发的管理平台，可以通过安装在农机上的北斗星远程控制器，将分散在各地的农机连接到网络系统平台上，从而进行实时监测、统一调度、协调管理，实现农机智能化升级。”河南省智能农机创新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河南省智能农机创新中心是河南近年来推进“互联网+农业”，服务“三夏”生产的缩影。跨区机收是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创举。尽管联合收割机总量充足，但在过去，受调度指挥难、信息不畅、在途时间长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区在高峰时段仍存在缺机的现象。

50岁的“麦客”刘成钦是河南鹿邑县人，今年是她与丈夫跨区收麦的第13个年头。每年麦收前，刘成钦会给各地的亲戚朋友、“老主顾”挨个打电话。小麦熟得如何，收割价格高低，哪里麦多机少，摸清情况后，再拟定行进路线，约定收割时间和大致的亩数。

追着小麦成熟的轨迹，刘成钦一路向北，从豫南起步，经河南进入山东，一直收到天津一带，历时1个月左右。这几年，刘成钦跨区作业的收入缩水了不少。“前些年，一台收割机收麦赚四五万元，现在只有一两万元。”刘成钦说，现在农机多了，麦收市场竞争激烈，如果能做到科学调度，让供需匹配，我们就可少跑冤枉路多赚钱。

如今，随着“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河南部分地区借助信息化手段，科学调度农机作业，使供需有效对接，正让刘成钦的期望变成现实。

河南许昌市农业机械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服务“三夏”生产，近年来许昌开发了“智慧农机测亩计产系统”，建设了许昌智慧农机信息平台，为全市2,400台联合收割机安装了智慧农机终端，具备定位导航、联动呼叫、智能测亩等功能，减少了“麦客”跨区作业在途时间，作业面积和粮食产量同时在终端和平台显示，有效减少了人工投入。

许昌县红伟农机合作社的124台收割机安装了智慧农机终端。理事长李红伟说：“终端非常好使，一台收割机比以前少雇1个人，一季最少节省开支3,000元。因为不用量地，收割机干的活更多，可增收5,000元，算下来一台收割机多收入8,000元没问题。”

“三夏”生产期间，许昌农机部门通过信息平台对机收动态进行24小时监测，在县与县、乡与乡之间对作业机械进行余缺调剂，引导机手合理确定转移路线，有效应对了高峰期局部地区缺机难题，极大地提高了农机作业效率。

许昌还推出“网约农机”手机APP。农民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后，可以方便地寻找附近三五公里范围内的联合收割机，通过一键呼叫、一键导航，能够迅速与农机手取得联系，自主对接农机，及时完成收割。

社会观察

中国品牌如何面对“华为效应”？

刘裘蒂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9年5月29日

美国最近通过行政命令对华为进行“围堵”，限制华为购买美国零部件的能力，为中美贸易战可能造成的供应链“脱钩”进一步煽火。各方揣测接下来其他中国企业有可能陆续登陆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包括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威视、无人机翘楚大疆等等。问题是，中国企业准备好了吗？

目前各方对于华为命运的猜测主要分为两派：华为高管高调反击美国“霸凌”，以及子公司海思芯片由“备胎转正”的宣言，使得中国国内的媒体和华为粉丝对于华为能够挺过这一关信心十足；但国际媒体方面，如路透社访问国际芯片专家，一般对于华为是否真能够自力更生、完全自给自足提出一个大问号。

虽然美国政府给了华为90天的缓冲期，但谷歌已宣布停止与华为的业务往来，这表示谷歌未开源版本的安卓系统、Google Play 框架、YouTube等服务，已在全球范围内禁止于华为设备上使用，预期将对华为手机的海外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

同时科技行业里每个与华为有合作关系的对应方都在研究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的范围有多广，就连英国的ARM也认为，由于其设计包含向多家美国公司购买的知识产权，因此构成限令中涵盖的“美国起源技术”，目前也宣布暂停授权华为关键技术。ARM生产像高通等制造商用来生产芯片的设计，也授权智能手机公司生产自己的芯片，海思至少从2012年起就开始制造基于ARM的芯片系统。美国科技评论把这个对华为可能形成的打击比喻为“这就像告诉可口可乐它不能使用碳酸水。”

面对美国的挑战，华为已经有备而来，去年的中兴事件等于是一场预演，一般认为华为在技术，特别是芯片方面，比中兴更具自主性。但目前仍在继续展开的状况已经显示，芯片将不是唯一的博弈。

因此华为的情况有三种可能场景：一种可能是华为遭殃，业务受到严重打击；第二种可能是华为杀出一条血路，变得更为自主独立，越挫越勇；第三种可能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比照中兴模式，为华为解围。一般来说，华为比中兴有更强大的抗压能力，也更早进入备战状态，正如任正非在5月21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的，他认为特朗普给华为的90天“宽限”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说起来，任正非应该也会拒绝中国领导人为华为求情，这样才能真正证明美国有眼不识泰山，太低估华为。

华为的遭遇将会使面向国际的中国高科技公司战战兢兢，特别是带有国家安全考

虑的企业，从通信到数字技术，以及国有企业。但如果华为受到的挑战能够成为其他中国企业的启示，这或许能使它们更迎接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挑战，更努力地探讨最佳实践。

虽然我并不主张中国企业脱离全球化的供应链而“自力更生”，但如果供应链的重组越来越成为不可避免的政治现实，中国企业必须面对，并且提早准备。

同时，我们必须先要看清，华为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较劲儿具有多个层面：自2012年以来，美国政府和国会一直把华为当成高度警惕的对象，认为华为的存在威胁美国的国土安全。此外，今年1月美国司法部以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为由，对华为和孟晚舟提出控诉，另外一起案件则指责华为偷窃商业机密。华为随后对于美国政府提出了诉讼，针对美国《2019 国防授权法》的合宪性，请求美国联邦法院判定这一针对华为的销售限制条款违宪，并禁止该限制条款的实施。

这几个月下来，美国政府不断对各国施压，企图阻挠华为参与他国的5G建设。目前对于华为的零部件禁售，表面上是基于国土安全考虑，虽然美国政府否认，但明显与中美贸易谈判的急转弯、悬崖式恶化有关。然而这多种层面的交织，加上关税战急速地蔓延为科技战，华为的未来能否藉由习近平和特朗普一通电话搞定，目前很难断定。另外，最近新一轮的关税加征冲突使得中美在短期内达成贸易协议更加困难。即使中美能够达成协议，一年来贸易战已经形成连锁效应，持续负面的报道和媒体渲染，足以造成强大的后遗症，造成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品牌正面临的公信度危机。

4月初在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的年会上，品牌专家埃德尔曼公司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埃德尔曼表示，由于对华为的安全担忧被媒体广为报道，这正在损害中国品牌的整体形象。

在孟晚舟去年12月因美国的引渡请求被拘留在加拿大之后，全球对华为的关注急剧增加。但在此之前中国企业已经在“埃德尔曼信任度测试”调查中接近垫底。根据去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的全球性调查（今年1月份发布），只有40%的受访者信任中国公司，而德国、瑞士和加拿大公司得到的信任率为70%。美国公司受到的信任率为54%。

而今年3月份收集的最新数据显示，孟晚舟事件和美国政府在一月底宣布对华为的两起诉讼使得中国品牌的信任度更为下降：

“我们在10月份进行了调查，3月份又进行了调查。华为的因素很重要。就在那几个月里，由于华为的问题，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度下降了5到6个百分点。不管是对是错，我要告诉你，这是全世界的看法。”

埃德尔曼在百人会年会上说：“我强烈建议，这是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上市企业）必须优先解决的一个问题。中国公司必须做可持续发展报告。它们必须有更好的管理。它们必须有更多面向公众的形象和说辞。”

因此，我们要问的是：如何恢复中国品牌的国际公信度？中国企业准备好了吗？

根据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的2018全球100强最佳品牌排行榜，中国只有一名企业入围：华为排名第68位（2015时排名第94）。这个排行榜要求上榜者真正地参与全球运营，至少有30%的营业额来自本国之外。然而Interbrand认为，在国外建立品牌正是中国的巨兽企业面临巨大挑战的地方。

美国市场一度是中国企业向往的练剑场，标准最高，但有助于自我提升。近年来美国市场形成险峻的阻力，这可能会使中国企业却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百人会”于4月5日发布了中美CEO即时调查。

这项报告指出，与中国高管对美国市场的看法相比，更多的美国高管将在未来五年内优先考虑中国市场。尽管两国同样有68%的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将优先考虑彼此的市场，但那些表示不会优先在对方国投资的都是中国高管。

只有超过一半的高管报告说，贸易战没有影响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开展业务的能力，但更多的中国高管反映了负面影响的问题。只有2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品牌受到美中关系紧张的负面影响，但表示受影响的人中有三分之二是中国CEO。

贸易战最大的影响，就是把以前对于中国品牌一些零碎分散的质疑系统化、深度化、以及全面化。所谓的“华为效应”带动了对其他中国品牌的质疑。那么或许有些品牌会说：“算了，以后我们就不要去美国市场。”但美国仍然是建立品牌公信力最有效的一个市场，因此中国如果由于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从美国市场退缩，对自己品牌的国际化进程会有负面影响。

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说，对于中国品牌的观感，与对中国国家的看法息息相关。根据盖洛普在今年3月11日发布的数据，在美中贸易分歧不断升级的一年之后，基于2月1日至10日进行的年度世界事务调查，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急剧下降到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41%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对中国有良好的看法，比去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

《纽约时报》在5月1日发文指出华为面临的“两难”：一方面得向世界证明它并不是中国政府的“白手套”，另一方面却得时时表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忠心。这篇文章强调“在其核心，从组织结构到建立员工忠诚度的方式，华为与中国共产党非常相似。”华为作为“民族工业”龙头的身份或许代表了最极端的例子，但其实不只是华为，很多中国企业、企业家或中国人，在美国主导的舆论下，都被诠释为“国家机器”的长臂延伸。

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有那些“硬伤”？埃德尔曼说，特别是在发达经济国家，中国公司得到的评价不佳，因为他们被认为缺乏透明度和对环境的关注，以及对员工的不良待遇。埃德尔曼同时指出：“对中国CEO的信任是世界上最底的。”全球只有19%的人信任中国CEO。中国创新、性价比和创造就业方面得分较高。

当然，西方主流媒体也不乏为华为叫屈的声音，比方说“科技乌托邦”的倡导者乔治·基尔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时对美国政府喊话：“华为是一项资源，而不

是威胁”：“仅仅因为中国企业来自中国而对之发难，将会削弱世界经济。”

但目前看来，在贸易战的烽火下，中国企业必须处于“备战”状态，严整考核自己对于外界技术的依赖度，自我技术的成熟度，以及危机公关的能力。中企必须自问：公司内部对于贸易战种种形势的掌握是否到位？是否能够充分把握跨境资讯而做出及时正确的评估？对外形象的把控和发言是否经过专业的操演？

举例来说，美国“黑名单”最聚焦的是中国企业可能带来的“安全”疑虑。这个安全考虑有两个层面：一是系统本身是否对数据安全、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造成威胁，这是属于“技术”上的问题；二是中国企业是否会为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在情报搜集或监控方面服务。

当大疆面临安全性质疑时，它的解释是：“DJI大疆创新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技术的安全性已经在全球得到反复验证，其中也包括美国政府和美国领先企业的独立验证。当用户使用DJI大疆创新的无人机或其他技术产品时，所生产、存储和传输的数据都完全由用户掌握。此外，DJI大疆创新还提供特殊的模式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信息安全管理需要，比如断开网络连接的本地数据模式、私有云部署模式等等。”但这个解释似乎只回答了技术层面的安全问题，并没有针对情报或监控“后门”的问题提出直接有效的反驳。

除了有效的表达内容之外，面向国际的沟通方式也很重要。大疆为了否认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指控“一些中国制造的无人驾驶飞机可能含有会危害用户数据并与中国政府可访问的服务器共享信息的组件”，通过中国官媒《环球网》的微博发表声明，而不是通过自己的英文新闻稿或推特。试想，当中国企业面对国际发声时，如果紧密与官方媒体捆绑在一起，是否更强化了美国人对于中国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刻板印象？我认为，大疆其实应该同时通过各种中国和西方媒体渠道表态，即使一时之间不可能扭转既定印象，但长期下来这是值得确定的习惯。

另外一个例子是去年11月回国，我在国内电视上仍然可以看到华为某高管出席会议时标榜华为的“狼性”文化。这个陈述似乎缺乏对于国外舆论的认知，因为在国际语境里，“狼性”文化已经与包括对知识产权在内的“掠夺性”对等。

华为的经验无疑将成为中国企业的教科书，如果中国企业能够从这个借镜，认知到技术实力的重要性，也学会更扎实的管理机制和国际公关，这将会带动下一阶段中国品牌的成长。

从出生率看中国经济

香港《信报》2019年6月5日

有人说中国千禧年后出生的人全是潜在千万富翁，因为父母同是独生子女，又是祖父母们的唯一寄望，万千宠爱在一身，亦是所有家财的唯一继承人，未来可能有五

六套房子在手。以现在内地房价高企，身家有千万元只能说是保守估计。不过，近日发布的一份人口研究报告，或许会推翻这个说法。

中国近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人们生育意欲下降。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人，较2017年大降200万人，创1949年以来的第二低。2016年开放全面二胎政策后，出生人口曾攀升至1,786万人，但之后便连续两年下滑，政策效应急速消散。

1949年以来，中国曾出现三波婴儿潮，70年代之前是鼓励生育，生育率在6左右（即每位妇女生6个婴儿），至九十年代已降至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已不足以补充人口需要。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也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

低出生率有什么不好？劳动力萎缩，人口红利消失，还有老龄化加剧。中国劳动人口峰值早在2010年见顶，预计到2050年，劳动人口将比2018年少四分之一。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80年的22岁，上升至2015年的37岁，预计2030年将升至43岁。

分母减少但分子增加，到2050年，每3.3个中国人便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不仅令经济缺乏增长动力，社会养老负担也日渐沉重。现时黑龙江等部分省份，养老金已入不敷支，未来财政缺口大概只会愈来愈大。

为什么人民不生育呢？一是经过30多年的一胎政策后，适龄生产妇女人数大减，潜在母亲少了，潜在婴儿数量也下降。二是教育普及和社会文化转变，从前读大学是少数人的事，社会平均学历是高中。读完书一两年没有事情做，父母赶紧催结婚。现在读完大学再工作打拼两三年，结婚起码要到25岁之后。当然还有社会文化转变，人们不以组织家庭、传宗接代为首要任务，结婚生子年龄自然地推后。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便是住房、教育、医疗等成本的急剧上升，抑制了生育行为，因为生怕生得出，养不起。内地房价急涨，房贷与收入比例从2004年的17%升至现时的44%，医疗费用同期亦增加20多倍。高房价会带来财富效应，但房价过高，却会让人不敢消费甚至生儿育女。

此外，从前的万千宠爱在一身，6个养一个，到小孩长大毕却后，却变成一个养6个，担子已不轻，又岂敢再轻易百上加斤？贸易战其实真的不重要，因为中国有一个庞大的本土市场。可是如果人口老化并减少，未来还有谁买房子呢？经济放慢又怎么办？未来的6套房子，会不会到手时价钱已跌了不少？因而，如何提高出生率，或许是当前同等紧急的要务。

综合治理

从大数据看中国都市圈人口迁移

沈建光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9年5月22日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情况，提振内需在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促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对于拉动消费增长、促进消费升级、提高投资边际收益，带动就业市场增长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镇化方向的改变：从“小城镇”到“都市圈”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截止2018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3亿人，较1978年末增加6.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比1978年末提高41.6个百分点。但和世界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城镇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一般认为，城镇化率达到70%之后才会进入缓慢增长期，中国城镇化尚且孕育着巨大的潜力。

在中国城镇化道路方面，过去十几年一直存在争议，以往中国的城镇化战略长期重视以中小城镇核心，控制大城市人口。而在今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中，新型城镇化战略更加强调以大城市引领的城市集群模式，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城市群发展，培育现代化都市圈，探索建立中心城市牵头的都市圈发展协调推进机制”，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方向的重大改变。

同时，《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亦从人口、土地、社会公共服务等多个层面给出新型城镇化的政策配套，支持城市集群的发展。例如，在户籍制度方面，提及全面放开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在公共服务方面，提出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涉及子女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诸多方面；在土地政策方面，提出深化“人地钱挂钩”等配套政策，并强调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中更多考虑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指标。

在笔者看来，这一战略方向上的改变，既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也与中国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相符，是中国城镇化战略市场化选择的结果，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将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为中国经济增长释放新的活力。

从大数据看中心城市的“逆城市化”

当然，尽管人口迁移以及城镇化研究对于宏观经济决策十分关键，但传统的人口迁移情况分析主要是依靠全国人口普查以及各大城市和地区的流动人口报告中获取人口流动数据，上述数据虽然样本覆盖面较广，但在数据时效性、统计准确性方面存在缺陷，亦难以对人口流动人群基本特征进行描述，继而对于政策指导意义受到限制。随着社交媒体以及互联网平台、4G手机的兴起和快速发展，近年来基于社交网络大数据、人口实时迁移的位置数据、以及移动通讯总量数据就人口迁移进行的大数据分析日益丰富，为精细和准确掌握人口流动基础信息提供了很好的支持。笔者基于京东大数据运算方法，深入分析了城市之间收货信息与身份信息的匹配情况，得到了一些中国城市人口流动的新发现，以下以中国城市群情况为例共享一些观察，以期对现有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分析框架提供一个新视角和补充。

根据总量来看，笔者发现，基于大数据观察到的一线城市人口迁移情况与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变化在2018年有所差异。2018年国家统计局显示，一线城市中，仅有北京是人口净流出，上海、深圳、广州均为人口净流入有所区别，而基于大数据观察到的情况，2018年一线城市的人口迁移均呈现净流出态势。

在笔者看来，造成上述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两类数据的统计对象与统计方法有所区别。统计局数据大多基于对城镇住户的抽样调查，抽样以本地户籍人口为主，对流动人口的覆盖面有限，导致抽样存在偏差，这使得即便是同样是官方数据，但各地也经常报出基于社会保障部门与统计部门得出的城市人口流动信息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同时，官方调查结果相对周期较长，对即时性的变化不如大数据反应的灵敏。

从趋势来看，不难发现，相似之处，即统计局数据亦显示出当前中国一线城市人口增长已然放缓，甚至净流出的事实。例如，2018年上海虽然人口净流入5.45万人，但近年来常住人口的变化已经非常小，2017年已出现了小幅人口净流出。同时，广州与深圳的人口净流入规模亦在2018年有所下降。这说明一线城市除北京2018年常住人口减少16.5万以外，其他城市虽然人口净流入，但增速已经减缓。

而基于京东大数据，这种中心城市逆城市化现象体现的更为突出。例如，2018年一线城市人口均已经出现了流出的现象，笔者发现，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线城市流出比例已经达到1.13%、0.95%、1.05%和2.56%。

从大数据看中国都市圈的形成

即便一线城市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但在笔者看来，这一现象也并不值得过于担忧，不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红利的消失。相反，在观察到一线城市人口流出的同时，中国城市都市圈已经悄然形成，特别体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说明中国城市群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承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极。

例如，上海方面，根据京东大数据，无论是人口迁入还是人口迁出，排在前五名的城市，除了北京以外，均是长三角周边的城市，即从迁入的城市来看，2018年迁入上海的城市中，苏州、杭州、南通、南京分别列第二、三、四、五位；而从上海人口迁出的城市中，苏州、杭州、南通分别列第二、三、四位，南京、无锡也位列前十，说明虽然上海人口有所减少，但主要迁往长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城市集群已经形成。

这一现象在珠三角的城市集群方面也体现的同样明显。例如，广州方面，从迁入情况来看，除了北京以外，深圳、佛山、东莞、湛江、茂名、清远、惠州、肇庆、中山都是周边城市，广州迁出城市亦在周边。而从深圳来看，广州、东莞、惠州、茂名、佛山这些珠三角城市均是深圳方面人口流动的主要城市。特别是从深圳的迁出城市来看，人口流出最多的区域是东莞，在笔者看来，这或与近年来东莞大量承接了深圳外溢的制造业密切相关，说明城市一体化加速发展，城市集群在珠三角已然出现。

当然，相比来讲，京津冀的城市集群效应弱于长三角与珠三角，但基于京东大数

据，笔者发现，北京的人才迁出地并不仅集中在北京周围，形成城市群，而是对全国具有辐射效应。具体体现在，北京的主要迁出城市前十名中，除了廊坊、天津、保定属于京津冀都市圈以外，上海、深圳、广州、成都、武汉、西安、重庆都是北京人口迁出的主要城市，占据七席。而从迁入城市来看，上海、广州、深圳迁入来源最多的城市是北京，这说明四大一线城市中，北京对全国的辐射能力最强，这或与北京重点大学云集、“总部经济”突出等因素有关。

综上，基于大数据，笔者观察到中国城镇化道路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效应，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构成都市圈悄然形成。而这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之路不谋而合，也是中国城镇化道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历史规律看来，尽管有基于大都市病的担忧，但都市圈的形成将有助于优化资源的分配，促进产业的聚集，带动就业机会的增加，不少国家在经历过探索之后也都回归到发展大都市圈的道路上。而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报告》，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12个城市群依靠不到五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聚集了中国人口总量的六成，贡献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八成。说明伴随着中国经济集聚趋势的日益明显，承载人口、产业、经济的主要载体——城市群与都市圈或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径，为中国经济增长激发新动力。

中国构建海洋牧场修复渤海生态环境

香港 中评网 2019年6月8日

虽然渤海海域已于5月1日进入为期四个月的伏季休渔期，但一个多月来，有着20多年打鱼经历的渔民杨兴武却一直没有闲着，他坐在海边的凉棚下，招呼着前来乘船出海的游客。

据报道，52岁的杨兴武是河北省唐山市渤海边上的王滩镇曹庄村渔民，他17岁开始打鱼。“那时候我们这里每个村都有二三十条小渔船，平鱼、比目鱼、鲷目鱼等鱼类很多。”

杨兴武说，2000年前后，随着大型捕鱼船只增加，过度捕捞现象出现，破坏了渔业平衡，鱼类资源开始减少，打鱼逐渐变得不景气。2011年他被迫停止了常年赖以养生的职业，花14万元买了一条休闲渔船，加入了当地海洋牧场的休闲渔业船队，8年来，一直在海洋牧场从事演示性打鱼，供游客体验海上生活。

渤海是黄河、辽河、海河三大水系汇聚的半封闭内海，海水交换能力差，海洋生态系统脆弱。多年来，由于过度捕捞、陆源污染等原因，渤海近海海域水体污染日趋严重，一些海域出现“海底沙漠”现象。

有着1,500多人口的唐山市乐亭县捞鱼尖村，几乎家家从事渔业相关产业。村里一位80多岁的张姓老渔民告诉记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一次海能捞3万斤虾皮。到七十年代，一网还捞过5,000多斤对虾。平鱼、镜鱼、鲷目鱼是渤海湾最好的三种鱼，黄花鱼、带鱼也很多，但这些鱼前些年已经几乎绝迹了。”

为恢复渤海近岸海域生态系统，自2002年开始，唐山海洋牧场实业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等国内多家海洋科研单位，以建设人工藻礁为突破口，营造贝藻礁生态系统。

从2009年开始，海洋牧场实施藻礁生态、藻场建设、增殖放流三项工程，10年来在祥云岛4,000亩海域内累计投放人工礁石构件77万立方米，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海参、螃蟹、石斑鱼等鱼类年产值达三千万元，实现了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共赢。目前正计划在2万亩海域进行扩建。

专家表示，唐山海洋牧场人工藻礁区海洋生物链已经形成，通过人工投礁，在礁体上生长马尾藻、刚毛藻、海膜、孔石莼等“海底森林”，集聚魁蚶、石斑鱼等多样性生物。藻类生长和滤食性鱼类生存，会减少海洋中氮磷污染，而底栖贝类又能有效降低水体中的悬浮物及藻类，达到净化水体的功能。

唐山海洋牧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振海说，唐山海洋牧场建立之初，就以“海洋修复为宗旨”，定位于“蚝藻礁生态系统”而非“人工渔场”。我们希望做的，是对海洋渔业资源枯竭的根本修复，从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和平衡。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现代化海洋牧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明确“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推进海洋牧场建设”。

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曾表示，通过加快建设海洋牧场，推动海洋渔业从近海走向远海、从普通装备向大型装备跃升、从传统渔业向自动化智能化现代渔业转变，开启深蓝渔业发展的新纪元。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建成海洋牧场233个，其中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86个，绝大多数采用的是人工鱼礁加增殖放流的管理模式。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许敏博士曾长期在唐山海洋牧场跟踪研究，他说：“唐山海洋牧场人工礁区内生物量是非礁区生物量的30倍以上。在礁区内发现了已经消失十来年的渤海本土鱼种，绿鳍马面鲀、牙鲆等，当地渔民在附近海域还观察到成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江豚嬉戏追逐。”

捞鱼尖村80多岁的老渔民说：“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消失多年的鱼类重返渤海湾，真是一大幸事！”

值得一提的是，唐山海洋牧场依托现有资源大力发展休闲渔业，目前共有19艘渔船加入休闲渔业船队，每艘船上有六七名工作人员，他们多是以前的渔民。

作为第一批转为休闲渔业的渔民，杨兴武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以前打鱼的时候，每天起早贪黑，又脏又累，碰到大风浪还有生命危险，一年下来也就挣四五万元。现在做休闲渔业，工作安全还有规律，一年能挣十多万元。”

环环相扣

中美贸易战的输家还有谁？

乔纳森·惠特利，瓦伦丁娜·罗梅伊 英国《金融时报》2019年5月23日

过去30年，很多新兴经济体一直依赖它们在全球贸易和供应链中的角色推动增长，但在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这个链条的中断正在冲击它们。

这种余波正在影响全球各地的增长预期，从拉美大宗商品生产国到亚洲的服装和电子产品制造国。愈演愈烈的贸易战事实上造福了一些新兴经济体，例如越南、韩国和台湾，因为企业纷纷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然而，事实证明，这并不足以抵消全球贸易放缓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整体影响。

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Netherlands Bureau of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的数据，今年2月，按3个月滚动平均值计算，全球贸易同比下滑1.9%，这是该数据连续第三个月下滑，也是自此次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

位于华盛顿的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洪川(Hung Tran)表示：“新兴市场面临的逆风正在增强。”因此，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今年新兴经济体将增长4.4%，为自2015年以来最慢。这一点在亚洲新兴经济体尤为明显，IMF预测，该地区的经济增速将达到2001年以来最低，为6.3%。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威廉·杰克逊(William Jackson)表示：“亚洲新兴经济体仍是全球增长迅速的一个区域，但增速将低于预期。”

国际金融协会(IIF)经济学家塞尔希·拉瑙(Sergi Lanau)指出，与今年早些时候的悲观相比，前景光明了一些；今年早些时候，一些分析师担心，全球将陷入衰退。他预测，今年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将大致稳定”。“这与人们几个月前的预测迥然不同，当时的报道听上去很像是全球面临衰退风险，”他表示，不过他承认，即便是这个预测跟这些经济体不久前的表现相比也是“变差了”。

中国国内政策的着重点，正加剧其贸易伙伴面临的经济不利因素。中国的增长模式重心正从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移，这遏制了对大宗商品的需求，而且中国正将制造业转移到国内。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到明年将国内生产的核心零配件和原材料的份额增至40%，到2025年将增至70%。

因此，这个10多年来对全球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将减少从全球其他地区、尤其是传统上为其供货的其他新兴市场进口产品。

洪川表示：“这些变化正减少全球供应链的戏份，无论美国是否加征关税。”

中国经济放缓加剧了这一点。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每年都在放缓，杰克逊表示，未来几个月，增长可能“弱于很多人的想象”。他表示：“对于其他新兴市场而言，这种不利因素可能会阻碍广泛复苏。”几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在国内还面临种种困难。阿根廷和土耳其尚未摆脱去年的货币危机，当时美元走强以及这两个国家自己的政策失误暴露了它们国内的种种失衡。

巴西的增长未能起飞，因投资者对该国新政府丧失信心。政治不确定性也困扰着墨西哥。让很多分析人士印象深刻的是，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之下仍保持财政稳健，但代价是家庭收入低迷和消费下降。

新兴世界的一些更亮眼的区域是那些受益于美国将与中国的贸易转移至别处的经济体。今年第一季度，美国来自韩国和台湾的进口同比增长20%，而来自越南的进口增长40%。来自东盟(Asean)国家的进口增长12%。

对于那些受关税影响的产品而言，这种影响尤为明显。2019年头3个月，美国来自越南的电话设备进口同比增长近两倍，电脑和零件进口几乎翻番。

美国来自韩国的办公机器零配件进口几乎翻倍，电话设备进口增长30%。类似的，来自台湾的电脑零部件进口翻了一番，办公机器进口增长近两倍。

然而，这些分流过来的贸易额还是太小，无法弥补这些亚洲国家对华出口的收缩——中国基本上是它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今年第一季度，所有亚洲国家的出口额都出现放缓或收缩。牛津经济研究所(Oxford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亚当·斯莱特(Adam Slater)表示：“中国的亚洲贸易伙伴居于此次贸易战的最大输家之列。”

北大西洋理事会的洪川表示，不能忽视这些警告信号。他表示：“如果你能设想一场新兴经济体的完美风暴，这场风暴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危险在逼近。”

对华贸易战能使美国经济真正繁荣吗？

美国 侨报网 2019年6月11日

就业率、股市市值保持双高，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年化季环比初值达到3.2%……自美国政府挑起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经济似乎还不错，这成了他们不断升级经贸摩擦的一个重要支撑。以至于一些美国政客信心满满地说：贸易战很简单，我们肯定赢。然而，对华贸易战能使美国经济真正繁荣吗？

贸易保护主义是毒药而不是良方，搞经贸摩擦没有赢家，伤人也必伤己。

如何看待美国经济所谓的“繁荣”，需要进行全面理性分析。从一些指标看，美国经济在往上走，但能否持续，一个要点是看资本积累的状态。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私人部门固定投资年增长率只有1.5%，明显低于2017年和2018年的同期第一季度的增速，这显然不是好兆头。根据美国官方发布的数据，2019年4月，美国耐用品订单环比下滑2.1%，超过预期2.0%的跌幅。衡量经济扩张的重要指标——核心资本货物订单4月

份下降了0.9%。从发展趋势看，经济界人士对美国经济的前景争议很大。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近期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许多经济师预测，美国经济2020年底以前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几乎翻倍，这主要缘于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有许多研究表明，从长期看，美国经济正处在所谓经济“长波”的下降期，不是稳步上升，而是稳步下降，包括美国前任财长萨默斯在内的很多学者用“长期停滞”来描述美国的经济表现。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中长期经济基本面得到了改善。虽然美国政客不断吹嘘“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但事实胜于雄辩。美国年均GDP增长率1950-1979年为4.0%，1980-2007年为3.0%，2010-2016年为2.2%，近两年为2.55%。显然，近两年的增长率不仅明显低于战后所谓的“黄金年代”和上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繁荣”，与奥巴马执政中后期相比也只是基本持平，更是远未实现经济增速达到4%以上的承诺。

人们普遍认为，近两年美国经济的“繁荣”主要靠减税和发债，基础并不牢靠。比如2017年底通过了《减税与就业法案》，短期看或许有助于美国经济增长，可以改善公司利润表从而刺激股市上涨，但长期看对于企业真实的生产、投资行为影响不大。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预算模型测算，2018年至2027年间，减税对经济提振幅度仅为年均0.06到0.12个百分点。并且，此次减税显著偏袒企业和富人阶层，将进一步扩大美国的贫富差距，从而进一步损害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以减税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有限，给财政造成的压力却是巨大的。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个完整财政年度（2017年10月1日-2018年9月30日），美国联邦预算赤字达到7790亿美元，较上年同期扩大17%，为2012年以来最高。今年2月，美国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公共债务规模达到22.0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近两年又增加了至少2万亿美元。被称为“新债王”的美国“双线资本”（Doubleline Capital）首席执行官刚德拉克直言，美国经济的增长仅仅是债务的增长而已。美国花旗银行也警告称，市场开始质疑美国偿付能力的“致命时刻”即将到来。众多美国小企业代表表示对美方征税措施感到担忧。

这一“致命时刻”很可能因为中美经贸摩擦升级而加速到来。美方志在必得的经贸摩擦将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成为拖累美国经济的沉重负担。从生产的角度看，中美制造业相互依存度很高，许多美国制造商依赖中国的原材料和中间品，相互加征关税必然提高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利润。从消费的角度看，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国内物价水平上升，消费者将为同等数量的产品增加更多的支出，因而在现有收入水平下必然出现内需下降。从进出口的角度看，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将直接导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下降，同时由于美国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导致美国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因而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也产生下降压力。总之，中美经贸摩擦将给美国经济带来全方位的负面影响，从而在经济增长、就业等方面形成较大压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近日撰文指出，美国关税政策明显违背了国际规则，将摧毁

许多制造业工作岗位，伤害美国农民利益，令美国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的模型显示，全面贸易战将导致美国就业人数从今年第三季度到2021年年中减少310万人，同时失业率到2021年年中将升至6.6%。英国《卫报》在评论中指出，中美经贸摩擦“几乎伤害了美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几乎没有产生赢家”。

事实上，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兑现。尽管美国一季度GDP数据表现尚可，但从需求层面来看，商品销售疲弱，消费者支出放缓，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速萎缩尤其明显，季度环比增长只有1.2%。统计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美国消费领域和制造业均出现明显下滑，反映经济活跃度的美国货运需求指标——“卡斯运量指数”的发货量指数下滑3.2%，连续第5个月走低。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NABE)公布的4月份调查显示，只有53%的经济学家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以上，而1月份时则有67%的经济学家这么认为。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格雷格·达科分析认为，随着减税及联邦支出增加的刺激作用减退以及贸易战的升级，会有更强大的不利因素抑制消费者支出的增长。

历史早已证明，贸易保护主义是毒药而不是良方，搞经贸摩擦没有赢家，伤人也必伤己。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席卷全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欧等国高筑关税壁垒、大打贸易战。殷鉴不远，美方在经贸摩擦上一条路走到黑，不仅不会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反而成为祸害美国经济的罪魁祸首，自己造的毒药自己吃。

寄希望于通过经贸摩擦来促进经济繁荣，只是一种神话、一个幻想。正如经济学家加雷斯·莱瑟所指出的，“它（贸易战）将对中国产生影响，但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而对美国的影响将更大。”

学术前沿

专家谈中部崛起 指日可待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近日在江西南昌召开。会议强调，当前中部地区崛起势头正劲，中部地区发展大有可为。实际上，中部崛起工作的部署已有十年之久。早在2009年，国务院曾出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09-2015年）》为中部崛起勾画蓝图。如今，在长三角“一体化”后，中央为何重提中部崛起？中部发展的优势在何处？实现中部崛起还需注意哪些问题？本栏目收集整理各大专家言论，以供领导参考。

内因与外因的共同要求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中部地区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制造业聚集区，承东启西，融南贯北，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在中国整体区域发展格局中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要抵御外部不确定性风险，需通过扩大内需稳增长、稳预期，而中部地区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经济增长后劲足，中部崛起对国家整体发展尤为关键。（新浪

财经网 2019年5月23日)

特殊时期的中部担当 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教授**张建清**：首先，中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四大板块的重要部分，在任何发展阶段，中部发展对全局都有重要影响；其次，目前中国不能单纯依靠外向型发展战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主要通过内需，中部地区恰好在扩大内需方面有较大潜力；第三，相比长三角和珠三角，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对中部地区的影响较小。在目前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国家需要新的增长点来保持平衡，而中部比较适合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要做好特殊时期的中部担当，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在国家政策层面加强对中部地区的扶持，针对中部的特殊需求精准施策、精准发力；其次，提高创新积极性，围绕创新做文章，把创新要素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第三，加强中部六省的联动与经济合作，推动内部一体化发展，破除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自由流通的壁垒；第四，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进一步提高中部对外开放水平，通过开放打破传统体制束缚，进一步深化改革。（东方财富网 2019年5月23日）

中部潜力有待挖掘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中部崛起是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大力推动的国家战略，是为了区域更好地协调发展。目前东部地区加快转型升级，国家需要进一步拓展内地发展空间，加快形成新一轮的产业集聚。另外，中部地区人口集中，市场空间巨大，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中部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有待挖掘。在目前新的国内外形势下，东西、南北差距还需进一步缩小，在此过程中要通过中部崛起来推动区域协调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部既要对内开放，也要对外开放。对内就是中部地区“西引东联”，把东中西部有机衔接起来，让资本、人才、技术在不同区域间能够高效流通和组合，迈向更高质量发展。对外就是要在新形势下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平台，吸引新一轮高附加值产业集聚，使其成为中部地区的增长极和创新极。另外，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为中部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和增长点。（新浪网 2019年5月23日）

中部地区崛起将很快迎来新一轮政策红利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这次座谈会提到要加大对中部的支持力度，希望中部发挥独特优势，可以预见，在未来发展中中部地区会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中部地区制造业基础比较好，要抓住新产业变革和新技术革命的机遇，转型升级，提升制造的层次，加快迈向中高端。因此，在培养先进制造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可以给予中部地区政策支持，例如在增加研发投入、发展高等教育、鼓励企业办学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承接产业转移方面，他认为，关键要靠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平台载体建设方面也可以加大支持力度，“比如说国家级产业园区，园区基础设施的前期投入不够，硬环境需要加大投入。”（《经济参考报》2019年5月24日）

中部崛起 指日可待 天津外国语大学“一带一路”天津战略研究院教授**冯雷鸣**：近年来中部地区崛起势头正劲，后发优势较为明显。2018年，中国区域板块的增长格

局发生了重大变化，GDP增速排名中，中部6省中有4个进入了前十，中部地区的工业增速也在全国保持较高水平。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部各省融入国家战略，从具体省情出发，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头突围、多极崛起的路径更加清晰。如湖北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支点，河南发挥“支撑作用”，安徽成为“创新极”，湖南提出“开放崛起”，红色江西绿色崛起，山西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共同勾画了高质量发展的“中部气象”，中部地区潜力可期，发展大有可为。（光明网 2019年5月28日）

信息快递

2019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任务 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6月5日报道，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两方面重点工作内容，一是要研究制定的文件，主要涉及健康中国行动、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互联网诊疗收费和医保支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月服务体系、加强医生队伍管理、医联体管理等方面的15个文件。二是要推动落实的重点工作，主要围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和加强医院管理等方面。解决看病难方面，提出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有序发展医联体促进分级诊疗、深化放管服改革支持社会办医、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等重点工作。解决看病贵方面，提出推进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推进高值医用耗材改革、巩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深入实施健康扶贫等重点工作。

湾区境外人才个税优惠细则将出台 香港《大公报》6月6日报道，备受关注的粤港澳大湾区境外高端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细则制定已近尾声，将很快发布。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今年3月16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广东省、深圳市按内地与香港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给予补贴，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至于对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及补贴办法，通知称按广东省、深圳市有关规定执行。

通知出台后，具体细则何时出台备受关注。5月25日，深圳副市长王立新出席公开活动时，宣布了一项吸引人才的新政：对在深圳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高端和紧缺人才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超过应纳税所得额15%的部分，将由深圳政府以财政补贴形式返还。这一说法被认为是深圳或将出台落实两部委《通知》地方细则的前奏。

大陆地方债计划发行额破2,000亿 台湾《工商时报》6月8日报道，10日起为期一周，全国各地计划共发行地方债总额达2,018.84亿元，为今年4月以来首次超2,000亿元。预计今年6月地方债发行规模将创年内单月新高。政府正加速地方债发行以刺激地方基础建设，国务院今年初提前下达1.39万亿元新增地方债务额度，今年新

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3.08 万亿元。4 月发布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意见，要求今年 6 月前完成提前下达新增债券额度发行，并争取在 9 月底前完成全年新增债券发行。今年 5 月地方债发行规模为 3,043 亿元，尽管低于第一季月均水平，但较 4 月增长 34%。截至 5 月底，发行地方债规模已超 1.94 万亿元额度，完成全年新增地方债务限额 3.08 万亿元的 62.99%。地方专项债券是地方政府融资重要管道，提供基建充沛的资金来源。从已发行的专项债来看，募集资金多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建设安居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今年起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 香港 凤凰网 6 月 10 日报道，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日前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到 2020 年，北京、天津、上海等 46 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其它地级城市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至少有 1 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到 2022 年，各地级城市至少有 1 个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其它各区至少有 1 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到 2025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加快生活垃圾分类系统建设上，要采取简便易行的分类投放方式。各地级及以上城市要以有害垃圾、干垃圾、湿垃圾和可回收物为生活垃圾分类基本类型，确保有害垃圾单独投放，逐步做到干、湿垃圾分开，努力提高可回收物的单独投放比例。

今年将加快基因编辑有关立法工作 香港《巴士的报》6 月 12 日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自今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据司法部、科技部负责人介绍，条例重在保护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促进人类遗传资源的合理利用，从源头上防止非法获取、利用人类遗传资源开展生物技术研究开发活动。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包括基因编辑在内的生命科学研究、医疗活动的规范和监管，国务院今年还将加快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和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方面的立法工作，与条例共同构成全过程监管链条。其中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方面的立法重在规范相关科研行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方面的立法重在规范相关诊疗行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按立法程序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5 月中国工业产出增长率为 17 年低点 英国《金融时报》6 月 14 日报道，今年 5 月，中国的工业产出增长降至逾 17 年的最低水平。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五发布的数据表明，今年 5 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这是自 2002 年 2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前一个月的 5.4%。5 月的数据还显著低于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所预测的 5.5%。5 月份，中国经济的一些方面确实表现出一些活力。5 月份，中国的零售销售总额增长强势反弹，从 4 月份的 7.2% 增至 8.6%，4 月份是自 2003 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月。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 5 月的零售销售总额仅会增长 8.1%。令人失望的工业产出数据反映出美中贸易紧张的升级。尽管与 2018 年最后 3 个月相比，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度以高于预期的速度增长，但分析师表示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归因于刺激措

施和放松信贷流动。包括信贷增长在内，近期的数据点逊于预期。近来数周，北京方面加强了支持措施以支撑经济发展，如鼓励地方政府在重大项目中使用专项债券。

地方政府不得为国企发债担保《香港商报》6月14日报道，近日，发改委发布《关于对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申请备案登记有关要求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指出，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申请备案登记需持续经营不少于三年。通知还提到，地方国有企业作为独立法人承担外债偿还责任，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不得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地方国有企业外债，不得为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提供担保。通知指出，承担地方政府融资职能的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仅限用于偿还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外债。通知强调，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应加强信息披露。在债券募集说明书等文件中，严禁掺杂可能与政府信用挂钩的误导性宣传信息。

本资料所登言论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 仅供党政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

责任编辑：吴健涛

本期编辑：何楚龙

校对：何楚龙

地址：城站路 85 号孝感市图书馆

电话：2823087

编辑日期：2019 年 7 月 24 日